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袁纯焕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袁 崇 煥 传

XXX 编著

目录

一、胸怀大志……002
二、初露锋芒……012
三、监军关外……019
四、宁远大捷……034
五、宁锦再捷……054
六、诛毛文龙……061
七、驰援京师……075
八、蒙冤而死……087
九、奇冤昭雪……102
十、光辉思想……108

一、胸怀大志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为不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这是袁崇焕写就的《边中送别》一诗。从他的这首诗中，就可以想见他那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慷慨激昂、以身许国的英雄形象。

袁崇焕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物，是明末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爱国将领，同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在明末抵抗后金的战争中，成为当时叱咤一时的名将，曾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１６２６）、宁锦大捷（１６２７）、保卫京师（北京）大捷（１６２９ ），使后金的两位英雄人物——后金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败于其麾下。后来，不幸死于金人的反间计和朝廷的党争，使其复疆雪耻之报国壮志未能实现，又横遭不白之冤。直至清人纂修《明史》，参校《清太宗实录》，发现设间的事实，真相得以大白，袁崇焕之千古奇冤才得以昭雪。几百年来，众多仁人志士深深为他的爱国深情

所鼓舞，作为一名杰出的爱国将领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受到后人的崇敬和爱戴。

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字元素， 号自如， 明末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年） 四月二十八日（６月６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水南乡。少年时生活在广西藤县的白马圩（莲塘村）。 祖父袁世祥，父亲袁子鹏，两个弟弟分别叫崇灿、崇煜。另外，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堂兄崇茂，是由他父亲抚养成人的。他在《三乞给假疏》中曾说 ：“ 我父亲没有丰厚的家财，年年都是拮据度日 。” 可见，袁崇焕的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他的堂兄崇茂是一位秀才，堂叔玉佩曾做过平乐府推官，亲戚林翔凤做过蓟镇督粮推官，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袁崇焕的家庭是一个产业不多的读书之家，除读书求仕之外，别无他业从事，大抵相当于中小地主一类。

袁崇焕生活在国家多事、边患严重的时代，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他出生之年，时值戚继光、俞大猷在福建广东边境剿灭倭寇不久，倭寇在东南沿海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时期刚刚过去；离蒙古族首领俺答汗接受明朝封号、停止在北方的骚扰也才二三十年时间。此时生活在东北的女真族又日益强盛起来。

明朝时候，在我国东北地区居住着的女真族分为

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即野人女真）三大部。勤劳而勇敢的女真人，生活在从长白山到黑龙江的广大地区，那里有丰富的物产，他们经常在松林里捕猎貂鼠等野兽，到山上挖人参，在牡丹江里采珠子，还牧养着大群的牲畜。他们常常用马匹、人参和貂皮等跟明朝官府和汉族商人贸易，交换粮食、布匹和铁制家具等手工业产品。女真族同汉族间的贸易和交往，促进了两族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叶以后，女真族逐渐从渔猎游牧生活向农业的定居生活过渡。

历史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统治集团的反动政策，总是经常破坏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造成不和与冲突。明王朝封建统治者对女真族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女真族地区设立了１００多个卫；其中在建州部女真设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女真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一本族内部的要求日益增长，反抗明王朝统治的行动连续发生。到明朝末期，建州女真的首领乘明朝国力逐渐衰弱，开始进攻明朝辽东地区。

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建州右卫首领王杲带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杲逃到海西女真地区，被当地女真首领缚送至李成梁处，李成梁将其处死。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王杲之子阿

台进攻沈阳，反被明军所围。建州左卫首领叫场和他的儿子塔失与明朝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又与阿台有姻亲关系，就劝说阿台停止抵抗，但阿台拒不肯接受。后阿台战败被杀，李成梁的军队在对战败者的一场杀戮中，叫场与塔失亦被杀死，此事后来就成为清王朝创建者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的借口。

努尔哈赤是女真族中杰出的英雄，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建州女真部在其领袖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为雪洗杀祖戕父（其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之仇，为反抗明王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政策， 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打曾勾结李成梁进攻阿台的建州女真苏克素浒部的首领尼堪外兰，继而又挥师女真其他各部，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至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 斩杀了世仇尼堪外兰，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称王于费阿拉。女真族内部的统一，适应了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女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接着，努尔哈赤挥师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部，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统一了海西女真；并以“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收服了“野人”女真。至此，生活在东北广袤地域上的女真民族摆脱了多年分裂割据相互倾轧的局面，统一在努尔哈赤的

旗帜之下。

努尔哈赤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创建了八旗制度，使原来各自为政、松散如沙的女真各部，形成有严密组织，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整体，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他还主持创制老满文，发展生产，立法治民，倡行喇嘛教……仅仅３０年，女真民族从分散、落后的奴隶制社会迅速迈进到封建社会，成为能与明王朝抗衡逐鹿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宣布自己为“汗”，建国号为大金，这就是历史上的“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努尔哈赤自觉羽翼业已丰满，即将八旗锋芒指向明王朝。四月十三日，他以“七大恨”告天，率军两万人接连攻占抚顺、清河，首战告捷，在大肆掳掠后退去。

正当后金兴起的时候，貌似庞大的明王朝却无可挽救地一天天衰败下去。最高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在位长达４８年，成为明代在位最久的君主。然而其荒怠、贪婪，亦开创了历史新纪录。

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起，神宗就不视朝政，不祭郊庙。朝臣空缺而不补，内阁只叶向高一人，六卿中赵焕兼领吏、兵二部。都察院长达八年无正官，十三道皆以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常任职十余人而

无人替换，郡守空缺达十分之三。袁崇焕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万历朝是继正德、嘉靖两朝弊政以后，明帝国迅速走向衰亡的时期。尽管万历的第一个十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锐意兴革，吏治、边防、财政有所好转，各种矛盾有所缓和，被誉为“财裕民足，四海晏然”。然而这也只是回光返照，转瞬即逝。 而且由于张居正生前勾结太监，大权独揽，对上约束皇帝，对下压制言官，已经孕育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张居正死后，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上下两方面的打击。后来，除了言官与内阁势如水火外，再加上主管考察官员的吏部，形成了三方面争夺权力的局面。万历中期，一部分较能主持正义的官员形成东林党，反对者为齐、浙、楚三党。万历中期以后，朝廷的历史基本上是东林党与三党势力互相消长的历史。

神宗摆脱了母后与张居正的约束以后，大肆挥霍享乐。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起，始兴矿税，派宦官四处开矿、收税，搜刮金银财宝，“纵横驿骚，吸髓饮血 ”，宦官横征暴敛、穷凶极恶，杀人莫敢问。天下生灵涂炭，加之各地灾祸频繁，而京师兴修不止，以致激起多起民变，形成此起彼伏的百姓反抗封建压迫的运动。与此同时，发生了浙人赵一平领导的农民起义。又因其朝廷和某些地方机构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其政治之败坏，可想而知。

所以“明之亡，亡于万历”，说得很有道理。

明朝中期以来，商品经济有了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土地兼并的现象也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君主专制制度愈来愈腐朽和黑暗。

天启初，东林党虽曾一度执掌政权，但积弊难除，阶级矛盾未见缓和。天启二年，爆发了山东徐鸿儒组织的白莲教起义，历时三四年。至天启六年，又爆发了摧毁明王朝的陕北农民大起义。熹宗年幼无知，终日挥刀弄斧，以木工活为乐，朝政交由宦官魏忠贤主持。原来的齐、浙、楚三党纷纷投奔魏忠贤门下，成为他的爪牙，合力杀逐东林党，形成气焰熏天、权势大极的阉党。当时的阉党专政，把明王朝的政治统治推到了极端腐朽黑暗的顶峰。

崇祯初，阉党首领魏忠贤被诛，东林党重新执掌政权。但阉党残余势力尚存，能量犹在，他们利用思宗缺乏政治经验又刚愎自用、多疑好察的弱点，以隐蔽的方式斗争，东林党最终为阉党排除，由阉党残余分子温体仁等攫取了政权，组成反东林内阁。

综上所述，明王朝在袁崇焕出生前后这一段时期，不但边患严重，而且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又严重分裂，确有内外交困、土崩瓦解、大厦将倾的趋势。特别是党争激烈，埋下了袁崇焕终被卷入其

中，并成为牺牲品的祸根。

广东的步兵素以“勇捷善战”著称。东莞一带更有尚武的民俗传统，群众从军的风气很盛。

边患严重、国家多事的时代和民俗尚武的生活环境，对袁崇焕有很大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他就胸怀大志，立志要激浊扬清、报效祖国、安定边疆、澄清天下。因此，他除了用功读书、在诗文书法方面取得可观的成就并从事著述（《率性堂记》）以外，还特别留意边防、学习兵法、练习武艺 。《明史》本传说他 :“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 ”,“以边才自许”。他自己在《过河林寺口占》诗中也有“多了从前学杀人”的句子。袁崇焕的这种胸襟报负与早他一百多年的英雄人物于谦“拔剑舞中廷， 浩歌振林峦。 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 。” 的志趣完全一致。 袁崇焕十分喜爱于谦的诗，他们都是意气轩昂、文武兼习、准备报国安业、有所作为的大丈夫，决不愿做酸腐无用的儒生。因为受同样的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影响，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也是一个慷慨知兵、擅长武艺之人。“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躯捷，身上飞鹏一羽轻”。 可见袁崇煜襟怀磊落，忧国忧民，身手矫健，武艺过人。此外，做堂乐府推官的堂叔袁玉佩、做蓟镇督粮推官的亲戚林翔凤也都懂得军事或者擅长武艺。另外，他的师友中也有不少热心

国事、有文才武略的人，有的还是沙场老将。

这些人与袁崇焕志同道合，相互影响，同气相求，渐渐形成了一个以爱国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袁崇焕为核心的爱国群体（当时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 袁崇焕兄弟俩还十分留意寻找英雄人物，与他们结为知己，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他们交往的人很多，其中有武举、典史，也有平民百姓。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随袁崇焕一起走上辽东前线，抵抗金兵的进攻，立下过汗马功劳。

从上述情况来看，袁崇焕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卫国安边的远大抱负，并且为了实现这种抱负作了相应的充分准备，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后来建功立业的基础。

袁崇焕在１４岁的时候，在藤县应考进学，２３岁中举，３６岁考中进士。中进士时的座师是韩爌。韩爌是东林党著名领袖之一，曾做过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大学士、首辅，思宗认为他“清忠有执 ”，曾予以通报表扬。袁崇焕和韩爌建立师生关系以后，就和东林党有了密切的联系，并把自己的命运和东林党联结在一起。而且不论从政治观点、师友渊源、平生交谊哪一方面，他都可以被视为东林党的一员。不过，因为他长期驻守边疆，和朝廷诸位大臣的交往过节极少，加之他劳苦功高，边境情势紧急，阉党暂时还不敢加以打击，或者还欲加以利用，故没有将他列

入东林名单。袁崇焕曾经在自己的诗中表达他对阉党的深恶痛绝、义愤填膺；对东林推崇备至，引为同调。并把自己未被列入东林名单，不得与诸东林正义之士共传千古视为平生憾事。袁崇焕与东林党人志同道合，荣辱相关，于此可见。

袁崇焕出生在“终岁拮据”的家庭，从小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并且看到了一些民生疾苦。再加上他的堂叔袁玉佩在粤林做官，亲戚林翔凤在蓟州做官，二人都以“廉洁”见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这对于袁崇焕踏入仕途以后能够保持廉洁的作风，并且对穷苦人民给予帮助，有密切关系。

二、初露锋芒

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３５岁的袁崇焕第二次进京会试，考中进士第三甲第四十名。

从此，袁崇焕踏入了仕途。踏入仕途的袁崇焕最初在工部任职，不久便被派到福建省邵武县做知县。他的《初至邵武》诗中认为要当好知县这一亲民之官，受任之初就该谨慎从事。他要轻刑简政，做好征收钱谷、安抚百姓两件大事，闲暇时读诗文书赋以开阔视野，或放松放松身心。

袁崇焕在任职邵武知县期间，因为他既有才干又有操守，所以治县成绩卓著。《白冤疏》中说他自从身为县令到官至大将，一贯是“恤贫扶弱”、“加意寒生”、“恩施井邑”。《乾隆邵武府志》说他“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又“矫健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些记载说明这位父母官有胆有识，有极高的判断能力和工作成绩，同时又能全心全意为民众办事，为百姓伸冤理屈。尤其是他能急人之难，见义勇为，亲自上屋救火也不怕有失官颜就更为难能可贵。这在当时的官场中是极为罕见的。至于“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则更见他身轻如燕，武艺不凡。此等文武兼得的人才，确是凤毛

麟角，实为人中龙凤，世所少有，况于江河日下之明王朝，天灾人祸不断、国家多事、边患严重之时，袁崇焕的出现于国于民实在是一大幸事。

最让人折服的是袁崇焕的操守：他在邵武任知县期间，上不贿赂大吏，下不欺压小民，真正做到“一钱不入”。后来，他做监军时，曾对熹宗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他在生活方面也自始至终是“第宅肃然，衣食如故”。他为官以后一直“家亦无余资”，至“死之日……所没者皆同产崇灿子兆基与弟崇煜及祖产”。可以说他的一生颇知人间甘苦，故袁崇焕才能够在当时明王朝吏治败坏、国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佼然出群的人物，这也正是后来魏忠贤阉党专权，他从不趋炎附势，和那些腐败官僚同流合污；在辽东前线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共历风霜雪雨、出生入死，为边防大业作出贡献的思想基础。

明王朝自丧失抚顺、清河之后大为恐慌，赶紧从各地调集兵马，任命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总兵李如柏、刘綎、杜松、马林分东南西北四路，领兵２０万，加之叶赫、朝鲜援军数万，号称４７万。明军于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二月誓师辽阳，企图合围赫图阿拉，彻底摧毁后金势力。不料明军的作战计划和出兵日期事先都泄露了，对方早已有了相

应的准备。努尔哈赤率领后金的全部兵力约６万人，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主动迎击。明军兵力分散又人生地疏，三月，明大将杜松勇而轻敌，在抚顺东南的萨尔浒山的一场战斗中全军覆灭，杜松战死。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转进，兵锋直指马林的一路明军，马林临阵先逃。努尔哈赤又用计诱使刘綎率军深入，然后在中途设下伏兵，加以夹击。刘綎力战阵亡，他所率的一路明军也全部被歼灭了。四路明军只有李如柏的一路没有和后金接仗，他闻风鼠窜，仓猝撤退。数十万明军仅仅一个月间便丢盔弃甲、一败涂地。这就是历史上的萨尔浒大战。萨尔浒战役充分暴露了朝廷和明军的腐败，也给明朝的有识之士敲响了警钟。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就一直处于防御的地位，而后金对明的战争则成为攻掠性的战争了。

袁崇焕开始做邵武知县的时候，正值杨镐所率之师萨尔浒惨败之后，辽东形势岌岌可危。深具报国壮志、大丈夫应先天下之忧的他，决不以做一个一尘不染、超凡脱俗、节操罕有的廉吏为满足。事实上，他从未曾有一刻忘怀边疆之事。抗清志士夏允彝（著名少年爱国英雄兼诗人夏完淳之父）在《幸存录》中说：“袁崇焕从少年之时就喜欢谈论军事， 见了人就拜为同盟，引为知己，为人豪爽、侠义，肝肠很热。他做福建知县时， 分房阅卷， 每天叫一个熟悉边疆战事

的老兵跟他谈论军事，宁可把阅卷的事情暂时放置一旁 。”这说明他认为研究边疆防务比用毫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取士重要得多，这体现了袁崇焕忧国忧民、虚心下问、重视调查研究的精神。这和孙承宗为辽东将领之时常向材官老兵询问辽事形势与险要厄道的作法十分相似，是深深值得称道的。

袁崇焕做了三年邵武知县，政绩卓著，经朝廷考核，列为上等。可惜的是流传下来的此方面事迹很少，今天我们只能略知梗概。清人袁珏曾作《前明蓟辽督师袁元素先生》诗，其中第二首对袁崇焕此一段时间的历史做了很好的概括：

名成榜上已中年，却被风吹落九天。
万井饥寒民父母，一身清白吏神仙。
沧浪诗话公余续，甑釜歌诗去后传。
三载循良来奏绩，济时又著祖生鞭。

诗中“甑釜歌诗去后传”一句用到了东汉范丹（字史云）的典故。其邻人曾作歌说：“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此后，人们常用“甑尘釜鱼”四字作为贫穷之家断炊之词。此处用“甑釜歌诗去后传”形容袁崇焕为县令时的廉洁清贫尤为贴切。

东北边防连接告紧，袁崇焕身在南国，也不得不

忧。通过与一些曾经卫戍过辽东的退伍兵士谈论，他对辽东等地的地理、人情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自认为有领兵打仗的才能，向往着有朝一日投笔从戎，立功报国于千里之外。

萨尔浒大战之后，后金乘胜占领了开原和铁岭，明朝的辽东防线被冲破。明万历皇帝急忙派善于用兵的熊廷弼作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双方的兵力情况，决定以守为主，修筑城池，充实军备，安抚军民。经过一番整顿，朝夕不保的辽东，形势有了好转。可是，朝廷里的一部分官僚，不顾国事的安危，从派别私利出发，攻击熊廷弼没有主动出击，终于迫使他辞职。刚刚变好的辽东形势又扑朔迷离起来。

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年）七月，明神宗驾崩，短命的光宗才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也死了。年幼的朱由校被扶上皇位，称为熹宗，改国号为天启。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 后金努尔哈赤趁明朝易主之隙，连连发动攻势。三月，在内奸策应下，接连攻克名城沈阳、辽阳。明军新任辽东经略袁应泰，在军事上是个外行，后金占领辽阳后他计无所出，自焚而死。金军继续前进，将辽河以东大小７０多座城池悉数占领，基本控制了辽河以东地区。为了巩固其辽东的统治，并继续西进，后金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后来又迁到沈阳。

辽东失守，明朝朝廷不得已又让熊廷弼复职，但是没有给他统一指挥关外军事的实权。他只带有５０００士兵驻守在山海关，关外的１４万军队却由在广宁的广宁巡抚王化贞来指挥。王化贞狂妄自大而实际上却不懂军事，他反对熊延弼提出的以守为主的方针，主张冒险进攻，想侥幸获得胜利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权位和爵禄，他几次出兵击金，都吃了败仗而返。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正月，金军渡过辽河，攻占西平堡。接着，后金又在内奸孙得功的策应下，不战而取广宁。掌握军事实权的王化贞在金兵未到之时就弃城逃走，一直逃入山海关。熊廷弼感到无力挽回既成的局势，就以他的５０００名士兵的军队作后卫，保护着逃难的百姓退入山海关。自此关外尽失。山海关受到严重威胁，明朝朝野万分惊慌，忙着讨论如何守关。

这时，袁崇焕正在北京参加地方官吏的考核。他看到国家情势危急，心里十分着急，整日忧心忡忡。等到官吏考核结束，袁崇焕被列入上等，他的声誉更高。此时正是东林党人掌政权的时候，东林党人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上疏说 ：“ 广宁不守则山海关震撼，山海关不固则京师动摇。现在保卫山海关，就是保卫京师的门户。 戡祸定乱必须借助于谋臣猛将。 目前在京朝觐的邵武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

用 。”（侯恂是东林健将， 当时极负盛誉，论者认为他的文才武略与洪承畴不相上下）。 于是天启二年二月，袁崇焕被授予兵部职方司主事（部里低级官员）。这一年正值他３８岁。

三、监军关外

然而一心渴望着立功封疆的袁崇焕，对兵部这一远离前线的职务仍觉不合心意。面对山海关危急的形势，明朝廷有的主张改派能将抵抗，收复失地；更多的人是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来，积极请缨的袁崇焕反倒没动声色。他虽然在北上之前已对如何抗击后金形成了自己的方案，但是，那终究是纸上谈兵。山海关内外到底是什么样子？后金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他还没有亲眼见过。按自己的方案能否击退敌军，也没有把握。为了确实做到知己知彼，他决心深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能够成行，他乘朝廷上下乱哄哄之机，既不跟同事们打招呼，也没有向家里人关照一声，独自骑上一匹马，悄悄出了北京城，向山海关飞驰而去。一路上，他认真地考察了关内外的地形、地势和明、金两军的行营、布阵，并和许多曾经和后金作过战的明军将士进行了详细的交谈，了解到了许多情况。经过此番调查，袁崇焕对战胜后金已经胸有成竹了。

新上任的兵部袁主事忽然不见了，连其家人也不知去向，一连数天杳无音信，使大家十分惊讶。正当

人们猜疑不定之时，袁崇焕回到了北京。他立即向明熹宗报告了当时关外的形势，然后毛遂自荐说：“只要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把关外的御敌责任承担起来。”在明军连告败绩，满朝文武正因广宁之败而一筹莫展、谈虎色变，惟恐榆关难保的时候，袁崇焕挺身而出。袁崇焕的这番言行确实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了解袁崇焕的称赞他才堪重任，怀疑袁崇焕也落得顺水推舟。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二月，兵部给事中蔡思允上疏曰：“山海一关，只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低薄塌记。溃卒、难民聚集此如斗之城，互煽互惊，立见乌合兽散之势。”为了整顿榆关防务，他说：“访得原任辽东兵备阎鸣泰、新升兵部主事袁崇焕，皆饶有才略，宜勒令分任榆关。”但是，昏庸的明熹宗还是不愿重用袁崇焕，只是授了他一个山东按察司佥事（军事巡查官），山海监军。

从偏僻八闽之区的七品知县，未经两个月，即升为五品佥事，这一提拔实属破格，但更令袁崇焕兴奋的是，他那马革裹尸、燕然勒名的壮志能够得以实现了。他在《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对朝廷保证道：“誓不以身蒙速进之耻”，“不但巩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他说：“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

在做了佥事监军以后，袁崇焕上疏陈奏方略，请

征调军队，重新组织抗金力量。朝廷就发出２０万两银子，令他招募散兵。临出发前，他特地去拜见了自己敬佩的现“乞罢”在京候审的前辽东经略熊廷弼，向他请教辽东边防形势和作战方略。见面之初，熊廷弼问他此去用何办法去对付金人，袁崇焕回答到：“我主张守而后战。”熊廷弼欢喜得跳了起来，认为和自己“坚守渐逼”的主张不谋而合，就替他画了详细的军用地图，把辽东到宣府的要隘都画了出来，并且注明戍宁的先后及注意事项。两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二人商讨军情直至深夜，袁崇焕才辞别出来。谁知这一别竟成了两位英雄的永别。此番长谈，也更增加了袁崇焕对自己既定方略的信心。

熊廷弼和袁崇焕一个主张“坚守渐逼”，一个主张“守而后战”，都在战略思想上强调一个“守”字，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那么，为什么那个时代明朝要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呢？因为当时除了战争的正义性在明朝这方面以外，其余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种因素方面，后金都占着一定的优势。具体地说，明朝虽大实弱，后金虽小实强。在集中作战的兵力、部队的战斗力量、正常的指挥关系、必要的财力支援等方面，明军都处于不利地位。加上明朝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等不利因素，这就决定了明朝在一定时期内只能采取守势，不能采取攻势，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熊廷弼、

袁崇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对双方力量对比有清醒认识，做到知己知彼；同时又经过深思熟虑，认真总结过去多次丧师失地的血的教训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在此以前，或者以后，凡是违反这一战略思想，贸然发动进攻，希图速胜的无不遭到惨败。因此，这种战略防御思想是当时惟一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袁崇焕出关以前在熊廷弼的帮助下，确立了并坚信这种指导思想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为后来取得宁锦保卫战的胜利打下基础。

以后不久，熊廷弼就遭到逮捕。过了半年，到天启二年八月，被魏忠贤等一意诬害而被冤杀，首级竟被传送到沿边的九个军区示众。当时，袁崇焕已经到了关外，看到他的遗容，见他须眉欲动，面色如生，不觉想起他往日的音容笑貌和深情厚谊，感到悲怆欲绝。就在深夜背人私祭、失声痛哭。又写下《哭熊经略二首》，回忆这次会面的经历，赞颂熊的文才武略，斥责阉党的滔天罪行，语多愤激，极为沉痛。如：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罄尽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二月，袁崇焕走向边关，开始了戎马生涯。这时，他３９岁。

袁崇焕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弃文从武，担任边防重任。这一重任，别人避之惟恐不及，他却主动承担，这是要冒极大的风险有极大的勇气的。因为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更何况当时形势紧张，危险既来自刀光剑影的前线，也来自剑拔弩张的后方；既有对外的军事斗志，又有对内的政治斗争。两种斗争，交错在一起，形势就更加险恶。本来，按明代的法律，凡是贪赃枉法或封疆失事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常常遭到杀身之祸。而自万历中期以后，朝廷党争愈演愈烈，斗争双方往往不择手段。贪赃纳贿和封疆失事当然也可以作为党争的工具，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熊廷弼后来被列入“封疆重案”，又被栽赃１７万，罪及妻子，一家都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就是明证。袁崇焕偏偏在这危险关头主动请缨，慨然承担边防重任，而且出关之前还不避嫌疑，不怕卷入在熊廷弼革职听勘之时前去访问，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就非要有极大的勇气不可。勇气来源于一个人的责任心和正义感，是一种高尚的情操。袁崇焕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清雪国家耻辱，甘冒杀身之祸和身败名裂之险，决不放弃自己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这种但求有利于国，不顾不利于自身的大无畏精神和爱国热情是

非常值得钦佩的。清代爱国政治家林则徐曾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 这两句话，袁崇焕在２００多年以前就已经做到了。

“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热血满腔、浑身是胆的袁崇焕万里从戎，正是寻找绝美的风景、 绝壮的音乐、高尚的生活。 为此，他乐于攀登奇险，弹奏悲歌，作出牺牲。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人生道路上作出的庄严抉择。确实，一个人的生命可以燃烧，也可以腐朽。袁崇焕不愿求安保位，不甘老死于户牖之下，决心献身于神圣的边防事业，使自己的生命燃烧起来，发出应有的光辉。于是跃马横刀、驰驱出塞、屡历艰危、出生入死，写下了生命史上辉煌壮丽的篇章。

天启二年二月，袁崇焕到职以后，起初驻守在山海关内，受巡视边疆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节制。三月以后，受新任辽东经略王在晋的领导。王在晋是一个不知军事、怯敌惧败，却又刚愎自用的家伙。王在晋命他移驻中前所，做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的监军，并且管理前屯卫的事务。袁崇焕一出关就烧了三把火，公开声明：我不惜命，深得王在晋的倚重。第一把火：由于军令不严，一部分兵士酝酿结阵而逃，王在晋令袁崇焕查问，他亲自追截，立斩数人乃定。第二把火：

当时明军仅驻榆关，前屯卫城屯不完，居舍未备，甲仗全无，粮草不继，十分艰难。王在晋令袁崇焕赴前屯卫安置辽东失业的难民。袁崇焕奉令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丛生、虎豹出没的荒野里徒步前行，直到四更时才进城，将士没有不佩服他的胆量的。他还主动要求领兵镇守前屯卫。第三把火：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八月，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就款，阎鸣泰与袁崇焕受命出关歃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王在晋对袁崇焕的评价是：其人有魄力、有大志，胸怀坦白，心地光明，迥迥出群。提请任命他做宁（远）前（屯卫）兵备佥事。但是王在晋缺乏军事上的远见，袁崇焕对于他只求守关、不图恢复疆土的这位上级却十分不以为然，二人意见不合。特别是在八里铺加筑一道关城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原来在广宁失败以后，如何巩固边防，防止金兵进一步骚扰，是当时朝野一致关心的问题，曾经反复争论。大体上有守关内和守关外的两种主张。负辽东直接军事责任的王在晋主张守关内。他深恐关外守不住，会因此获罪，命之难保，就主张缩短防线，放弃关外，在靠近山海关的八里铺加筑一重关城，设置重兵驻守，并美其名曰 ：“ 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 这是一种消极退避、单纯防御的主张。袁崇焕和另外一些下级军官坚决反对此种做法。他们主张 ：“ 捍关外以守关内 ”，并且主张

守离山海关较远的宁远。 原因如下：（一）疆土不可随便放弃。（二）守卫宁远进可以据广宁， 退也不失为山海关的屏障，守住宁远，就保住了通往山海关的咽喉。从宁远一带的地形来看，北面是山，南面为海，宽不过４０里，可以使用伏兵袭击敌人。如果敌人攻宁远不下，越过宁远前进，那么在山海关到宁远的狭长地带中很容易被切断归路。敌人如果胆敢直抵关门，那么，前有坚城，后有劲兵，更容易被消灭。与此同时，宁远可以和它以南２０里海中的觉华岛互为犄角。敌人攻宁远就可以用岛上的兵袭击敌人的后方三岔河一带，以为牵制。宁远所需的军需品，也可以由海道运到觉华岛，把觉华岛作为一个补给基地。岛上的水师又可以和山东、辽东沿海一带通声气，一有机会就可互相配合袭击敌人。这是水陆联合、可攻可守的作战方略。在当时明朝水师占优势的情况下，此种布防十分有道理。同时，宁远距离十三山不过２００里，还可以就近把前次战役失败后逃到十三山的难民十万人救将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王在晋不同意袁崇焕的这种主张。因为此事关系到明边防得失之大要，袁崇焕在几次力争不得以后，就向东林党魁首叶向高申述，并自告奋勇，表示情愿去守宁远。叶向高一时不能自己作出决定——这不能凭想当然做决定。这时同为阁臣的孙承宗自请巡边，亲往裁决。

孙承宗，字稚绳，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考中进士。天启初曾充当熹宗的讲官。广宁溃败后，擢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亲自勘察了关外的山川关隘， 认为宁远的形势是包山阻海，“ 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必不可不守 ”，驳斥了筑镇八里铺的种种理由，接着，孙承宗召集众将讨论战守 :“ 阎鸣泰主觉华（今菊花岛），崇焕主宁远（今兴城）；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 。” 在意见纷纭的情况下，他宣布休会，后经勘察，下令以袁崇焕守宁远的建议为决议。袁崇焕的正确主张初步得到了采纳。

当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正月，王化贞在广宁失败之后，义州大侠招集明朝溃散的兵士、难民十万人闭城坚守，誓死不肯投降后金。他又令毕麻子兄弟率领一部分人在十三山扎营结寨。后来毕麻子合并了杨三的部下，派勇士陈无民入关求救说 :“ 十万义民仁uu g\ 嘵 導Z; “ 十万义民

崇焕查核军伍，发现了有人以空名支饷，未报经上级批准，就把一个军校斩首。孙承宗责他道：“监军能擅自杀人吗？”袁崇焕顿首谢罪。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驻守宁远，以贯彻守宁远以保卫山海关的计划。

不久，张凤翼代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又主张放弃关外专守关内，和孙承宗意见不合。九月中，孙承宗召集将士商讨到底该守何处。许多人都主张守关内。袁崇焕力排众议，仍坚决主张守宁远。孙承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毅然地说道：“我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报国了！”就命袁崇焕和满桂一起守卫宁远，并且重筑宁远城。

宁远东边靠渤海，西边是山岭地带，形势险要。起初，孙承宗派游击祖大寿筑宁远城。祖大寿认为明政府不会真正远守关外，因此只筑了十分之一，而且城墙筑得非常单薄，不合要求。因此孙承宗欲斩祖大寿，袁崇焕力救方免，祖大寿遂成为袁崇焕最得力的心腹之一。袁崇焕着眼于百年大计，制定了筑城的规格：城高三丈二尺，墙基宽三丈，墙顶宽二丈四尺，城墙顶上的护身垛高六尺，城周九里一百二十步。他亲自担任筑城总指挥，令祖大寿和高见、贺谦等将领分别督工，认真修筑。经过广大军民一年的艰苦劳动，宁远城按照袁崇焕的标准全部竣工。自此，宁远城就

成为关外的一个军事重镇。这时，袁崇焕的父亲去世了，按当时的习俗，父丧应卸任回家守孝三年。但是，为了抗金大业，他断然夺情留任，誓与宁远共存亡。袁崇焕长期驻守在宁远城，他勤于职守，身先士卒，关心部下疾苦，与士卒同甘共苦，迅速在将士们心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人人都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勤奋地工作。不久，宁远城就商旅云集，流民来归，成为辽河以西一个最富裕的地方，也是在金人统治下的辽东人民向往的一片乐土。这座由袁崇焕倡议并努力建筑、经营起来的宁远城，一直到后来宁前总兵、大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前，始终屹立在边防前哨，是山海关的有力保障。因此，宁远城的修筑可算是袁崇焕对辽东边防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清楚地证明了袁崇焕军事上的真知灼见。和袁崇焕同时代的黄尊素（东林名士，黄宗羲之父）在所著《说略》中说 :“ 宁远在山海关以外，孤悬于蒙古与后金之间，袁崇焕毫无惧意，筑城凿濠， 屹然成为重镇。他曾写信给当局说 :‘ 我在宁远，北京可以高枕而卧了。’” 从这段话中，可见黄尊素对袁崇焕的推崇，也可以看出袁崇焕坚守宁远以捍卫关内的坚强信念。

但是，这时朝廷上还有不少人对坚守宁远缺乏信心。于是孙承宗在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二月上疏奏陈边防大计，力言宁远可战可守，是为必争必据之

地，请求朝廷不要被一般大臣的错误意见所动摇。他曾比较袁崇焕和张凤翼说 ：“我愿意任用袁崇焕，因为他竭力尽心，急公好义；而不愿意任用那个逃避危难的大富翁，闭门念经的胆小鬼 。”可见孙承宗对袁崇焕是十分器重的。后来，孙承宗又认为袁崇焕应辞去山石道，专任宁前事务，才能有所作为，于是改任袁崇焕为宁前道。

宁远城筑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辽河以西的防务，并继续东进收复失土，袁崇焕准备向锦州推进，建立起一个宁锦防线。就在天启四年九月，同总兵马世龙等率领水陆马步军１１ ２万人东巡广宁。这是明军经过两年操练，业已众志成城的一次战略行动，深入到明金双方都没有占领的空白地区进行巡视，虽然未与后金交锋，但锻炼了军队的胆气，摸清了大凌河、三岔河（今辽河）、 以及海州（今海城）、 盖州（今盖县）一带的水陆机宜，兵马虚实，为恢复辽西乃至辽东失地作了很好的准备。东巡期间，袁崇焕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布置边防，成绩卓著，又连续被提升为兵备副使和山东右参政（明代辽东归山东管辖）。

东巡之时，他一路观察形势，策划如何作战、如何防守。东巡归来之后，正式向孙承宗建议重建锦州、各屯诸城。到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夏天完成种种准备以后，他就派遣将领分头占领锦州、松山、杏山

以及大小凌河一带诸战略要地，修缮城郭，准备固守，练兵屯粮。这样一来，又继宁远之后，向前推进２００里，天启初年的失地已尽数收复，宁远反成为后方了。

自从天启二年袁崇焕出关，到此时为止，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由于袁崇焕保卫关外以守关内的正确主张被采纳，以及后来积极赞助孙承宗规划守备，计前后收复失地４００里，修复城堡数１０座，练兵１１万人，裁减淘汰老弱兵校７０００余人，省经费６８万，建立了东营、水营。造铠甲、器械、弓矢、炮石等用具数十万，开屯田５０００顷，岁入１５万。于是东北形势大为巩固，财政负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关内外人心开始安定下来。

袁崇焕此时充满了积极进取、乐观顽强的精神，其心情亦十分舒畅。从他的《边雨》一诗中可见：

风斜雨急阵云平，想为军中洗甲兵。
万帐关心衣暗湿，一时昂首马齐鸣。
防人薄我晨传剑，避水移山夜拔营。
颇幸屯田今岁熟，先期十日早收成。

在这一段时间里，后金因为忙于加强对辽河以东的统治，也因为明军无懈可击，几年之内，按兵不攻，

明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一直到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十月，孙承宗被魏忠贤排挤去位，辽东形势才发生新的变化。

四、宁远大捷

正当袁崇焕等在辽东边防前线艰苦奋斗，苦心经营，励精图治的时候，明王朝的政局却一天天败坏下来。明王朝中的实权派、宦官集团的头子魏忠贤见边防战事形势有所好转，利用熹宗昏庸无知，勾结朝臣，朋比为奸，其势力日益膨胀。

他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握了在内阁代皇帝草拟的诏旨上用朱笔加批的大权，实际上是代替皇帝处理政事，从而裁决朝政。

他又亲任东厂的提督，取得了特务机构的指挥权。其他军权、人事权、财权也几乎全部掌握在他手中。而此时，熹宗则终日热衷于引绳削墨，以做木匠活为戏，对国事全然不予过问。天启初年被东林党排斥的一批腐败官僚看到魏忠贤权势很大，就纷纷投到他的门下，谋求功名利禄。 当时有“王虎”、“王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各地巡抚、巡按又纷纷给魏忠贤建立生祠， 并且“曲意献媚， 务穷工作之巧 ”，少者花费银两几万，多者几十万。顺天巡府刘诏谒祠时， 见魏忠贤像， 甚至行五拜三叩首礼。当时魏忠贤权倾朝野，确实是“义子满朝廷，生祠遍天下”。 这样，就形成了腐败官僚与宦官互相勾结的

阉党和极端混浊的政治空气。阉党把自己的党羽顾秉谦、魏广微等安置在内阁中，同东林党人争夺权力。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九月左副都御史杨涟首先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左光斗等东林志士群起响应，魏忠贤大兴党狱。阉党排去首辅叶向高、韩爌等，又编造黑名单，如大学士魏广微编的“邪人”、“正人”名单，工部侍郎崔呈秀所编的《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有计划地陷害、屠杀东林党人。阉党横行，炙手可热，建立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政。

叶向高、韩爌既是东林领袖，又是当时的人所共望。他们被迫辞职，意味着“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吏治边防，江河日下。这不能不引起袁崇焕的极大忧虑和孤立无援的感觉。他在《叶台山相国乞归得请，赋诗寄之》诗中说：“先生今竟去，世事更堪忧。举人疑高马，无人为丙牛。乞身原贵早，屈指势难休。肯为苍生计，艰难再少留？”诗中指斥魏忠贤之奸，比喻其为心怀叵测、指鹿为马的赵高；痛惜叶向高之离去，慨叹朝中少了燮理阴阳、过问牛喘的贤臣丙吉。他虽然知道政局败坏，为个人考虑乞请归去应该早提出，但为了国家社稷的安危，还是希望叶能够留在朝中，勉为其难。末尾二句恳切慰留，情见于辞。然而，事实上袁崇焕自己又何尝不是在“乞身”与“难休”的矛盾中稍事停留呢？

阉党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为了排除疑己，他们不惜颠倒黑白，破坏边防，冤杀将帅。为了对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进行政治陷害，竟然诬陷栽赃他们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对他们严刑拷打，竟将他们残害至死。阉党毫无人性的专政，加深了苍生的灾难，也削弱了抗金的力量。

孙承宗是东林干将之一，德高望重。起初，魏忠贤想拉拢他，使其依附于自己，成为自己的党羽。于是曾经派太监刘应坤等同孙承宗联系，不料孙承宗置之不理，魏忠贤因此大为恼火。不久，魏忠贤又排除了东林党人赵南星和高攀龙。孙承宗得到这个消息，本想送上奏本，向皇帝力争，但是考虑到奏章上去，未必能够送到皇帝手中，于是打算入朝面奏，却又遭魏忠贤、顾秉谦等所阻，没有能够成功。接着阉党分子崔呈秀等连续上书攻击孙承宗，孙承宗因此上书求去。恰九月里马世龙因误信传闻，派兵袭击耀州，在柳河受到金兵的掩杀，死了４００多人，谄附阉党的朝臣纷纷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孙承宗就此决意辞职。袁崇焕看到阉党势力日益猖獗，正直的朝臣纷纷遭到迫害，连在边疆上的孙承宗也受到排挤，觉得边事实在无法继续支撑了，就也想和孙承宗一同离去。他每次见到孙承宗， 都痛哭流涕，要求辞职。 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十月，孙承宗辞职获准。孙承宗的挂

冠而去，对袁崇焕等几年来奔走风霜、驰驱险恶的边将无疑都是极大的打击。

继任经略是兵部尚书、阉党分子高第。高第是一个没有骨气，没有胆量的小人，一贯反对守关外的政策。他一到任就言道：“关外必不可守。”下令把刚刚建立起来的锦州、右屯诸城的防御设备全部撤离，守城将士全部撤到关内，只把关外作为巡哨侦察之用。袁崇焕向他据理力争：“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大凌河是前锋要冲，三城既已恢复，决不可随便放弃。如果锦州、右屯稍有动摇，那么宁远、前屯必然震动，山海关也失去了保障。现如今只有选择良将，加强守备，派左辅守大凌河，樊应龙等守右屯，更令一将守锦州。三城屹立，一面防守，一面待机前进。这样，不但能够坚守宁锦，而且还能恢复全辽。”但是，高第不听，并且要把宁远、前屯卫的守备也一齐撤掉。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宁前道，既然做这里的官，就应该死在这里。我坚决不走！”高第没有办法，只得把宁、前二地保留下来。但是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诸城的守备全部撤掉了。撤退的时候，“委弃米粟十余万，死人载道，哭声震野”，弄得“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先已看到边事无法支撑，想和孙承宗同去，现在又眼见自己花了数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宁锦防线无端破坏了，非常愤慨。特别是

魏忠贤为了安插私人，控制边防力量，曾经派了许多监司到辽东来，使他不能很好地行使职权，以至“将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马之虚实不得问”，更使他苦恼万分。

恰巧不久前，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在接到家信以后，就呈准上级回家守制，并且办好了移交手续。可是从他做邵武知县起到现在担任宁前道，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没有半点积蓄，这时他离职回家，竟穷得连行李盘川都没有。幸而有许多同僚赠送盘资，他酌收了一部分，才勉强成行。不料行到丰润，接到圣旨，不准他归家守制，命他回去照供旧职。当时，他极不情愿，就连续三次上疏请求回家料理丧葬。由于阉党暂时还要利用他守卫边疆，三次都没有批准他的要求。他不得不遵旨回任。袁崇焕在回任时上疏说明自己坚持离职的原因说：“臣不能与不应手之人而任”；“闭关而守，无名示弱，臣不能任也”；“日日恢复，日日延挨，臣不能任也”。又说：臣任之，非但谨守宁前而已也，必将整练兵马，广开屯种，“以天下复辽东，以辽东还天下”。这些话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能和不应手的阉党共事，也严正地指出高第撤关外、守关内的主张是“无名示弱”，是“日日恢复，日日延挨”，并且提出和高第完全相反的意见。他当时还是一个参政兼兵备副使衔的监军道，竟敢同顶头

上司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相对抗，这充分说明了他对边防事业的勇于负责以及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所畏惧的精神。不但如此，对魏忠贤随意安插私人党羽，滥派监司，使他无法行使职权一事，他也愤怒地提出抗议和警告。他说 ：“ 此中锋镝之场，勿以为功名之地！辽阳、广宁皆以官多不和而败……前覆可鉴 ！” 这分明是对炙手可热的魏忠贤及其同党加以指责，说他们不应以边疆为猎取功名、培植党羽之地。在当时，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决心的。可是清初修撰的《明史》却记述袁崇焕曾在宁前为魏忠贤建过生祠。以袁崇焕与东林党人的政见相符，又一再受到东林党的器重和提拔，与东林党的关系极为密切等情况看来，《明史》的记载显然有误。 袁崇焕的奏疏送上去以后不久，阉党为了敷衍他，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升他为按察使，让他照旧负责宁前的守卫工作。

后金努尔哈赤看到孙承宗被排挤，新任经略高第仓惶退去、懦弱无能，认为明军不能坚守关外。他们又看到袁崇焕在宁前孤立无援，兵力单薄，认为若此时发动进攻，一定可以攻下宁远城，而且可以乘胜直取山海关，打开进攻北京的通道。于是利用锦州、右屯守军撤退，局势混乱，人心不稳的时机，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正月，努尔哈赤以倾国之师十三万人大举渡过辽河，向宁远进攻。那时候，袁崇焕部下

只有一万多人，仅及金军的十分之一，关外人心惶惶。明王朝政府接到警报以后，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事宜，大家却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众人皆认为宁远城绝对是守不住了。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骐都带着兵将守在山海关上，不敢发兵救应。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带兵越过宁远城５里，在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扎营，截断明军的退路，将宁远围得水泄不通。努尔哈赤派人向袁崇焕劝降说 :“我带了三十万大军，来攻宁远，把城拿下来是绝不成问题的。你们如果来降，就给你们做大官 。”袁崇焕早已下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毫不动摇地回答说 :“你们无故向我们进攻，是什么道理！宁远城是我们的地方，既经我们修复之后，当然应该死守，岂有不战而降之理 !”接着又说 :“你们所谓三十万大军，实际不过十二三万，我们也不会比你们少 !”这表现出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为了激励士气，袁崇焕同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通判金启□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并派满桂守东面，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分区划守，相互支援，满桂还负责提督全城。他又亲自刺血写书，对将士下拜，还拿起一把草，放在嘴里咀嚼，并且吞咽下去，对众人说 :“如能同心死守，我愿意来生变作牛羊，报答大家 。”众将士一向爱戴这位同士卒共甘苦的监军，读了满纸忠

愤的血书，眼见袁崇焕吃草的行动，都感动得流下泪来，纷纷向袁崇焕表示：愿意与君以死报国。于是袁崇焕留下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以示自己准备牺牲和抵抗到底的决心。

袁崇焕早已探明后金动向，积极做好各项战前准备。一是坚壁清野。他令城外几处守军全部撤回城内，下令把城外房屋全部烧掉，令城外居民带着一切守城用具进城。二是赏罚分明。他亲自椎牛、杀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城中全部库存白银置于城上，声言：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则立斩于军前。他还通知前屯及山海关守将，不准放过一个逃兵入关。三是察捕奸细，全民参战。袁崇焕命人沿街巡逻全城，对乱自行动和擅自下城的人即行正法，不放过一个可疑之人。命通判金启□编派民夫，供给将士饮食，运输物料、矢石、火药。四是启用大炮，准备火器。城中存有仿西洋新造的所谓“红夷大炮”，从未使用过，此时也架上城头，各类火器一应准备齐全。金启□还将火药匀筛于席或被子上卷起，实战时抛至城下，射火药将其引燃，号称“万人敌”，专治城根大炮死角之敌。待森严壁垒，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人心开始安定下来。

二十四日，袁崇焕与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谈古论文，颇有诸葛武侯的儒将风度。是夜二时，忽闻一声

炮响，后金开始攻城，八旗兵丁漫山蔽野而来，先扑西南城角，被明军猛烈的矢石和西洋大炮击退。接着，努尔哈赤又派精锐的战士，披着双重铠甲，推着铁裹车撞城，每一次撞击，都发出巨大的响声，使城垣受到震动和破坏。后来又用像云梯一样比城还高的车子向城垣猛冲。这种车子上面有几寸厚的木板遮蔽，外面裹以牛皮，下面伏着兵士。在这种车子的掩护下，金兵冲到城墙下挖洞。这时，城上矢石像雨点一样地打将下去，打死众多的金兵。但是，金军进攻得久了，城基凹了进去，金兵躲在里面继续挖城，城上的矢石却打他们不着。袁崇焕就及时指挥部下，把预先准备好的大木柜抬出来，一半搁在城垛里面，一半露在城墙外，让兵士伏在木柜内，向下投掷石块，这样，消灭了城底的死角，更容易命中目标。可是金军仍继续冲到城下挖城，经过好长时间，城垣有三四处被挖凿开来了，所凿洞有二丈宽，城墙险些堕倒。袁崇焕奋不顾身地站在士卒的前面搬运石块堵塞缺口，不幸身上连续两处受伤，部下都劝他退下前线，他厉声说："别看区区宁远城，它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宁远失守，几年以后，我们的父母兄弟都要成为金人的奴隶！到那时苟且偷生，有何乐趣 !"说罢撕开自己的战袍，包扎好左臂的伤口，更加用力搬运石块。众将士见此，无不感奋，争先恐后地掩护着他，缺口被迅

速地堵塞起来。此时，藏在柜中的明军兵士，将柴草、棉花、庄稼秸杆浇上油脂，点燃向城下金兵投去，加上金启□的“万人敌”，油脂、火药很快燃烧起来，而且烧得很猛烈，金军愈是想扑灭，愈是烧得厉害，城下金军的车子很多，拥塞在一起，金兵想走也走不脱。结果，金军兵士有好多被烧死，车子大都被烧坏，后金损失惨重，只好败退下去。第二日，金军又来攻城，袁崇焕下令发西洋大炮。炮一发，只见数里之外金兵狂奔不止，上百人毙命，一发就炸开很长的一条血渠，又使金军死伤了一大批人。如此，连续激战三日，金军三攻三败，最后因伤亡过重，只好解围而去。努尔哈赤本人也在这次战役中受了伤，这是他对明朝发动进攻以来的首次失败。他气愤地对人说：“我自２５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怎么一个宁远孤城竟攻不下来！”努尔哈赤在退回到辽河以东之后，过了几个月，终于因为心情抑郁，伤势严重，不治而死。明军方面也伤亡惨重，后金攻宁远不下便踏冰席卷觉华岛，岛上数万军民全部遭难身死，船只粮刍亦尽数被焚毁。但经过一场恶战之后，宁远城仍岿然屹立，后金“辫子兵”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被打破了，朝廷内外为之欢欣鼓舞，袁崇焕一举成为中外瞩目的名将。

宁远战役，明军以少数兵力，抗击十余万后金军

队，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奇迹的出现，固然有努尔哈赤久胜骄心日盛，对袁崇焕的防御力量估计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袁崇焕领导的正确，成竹在胸，指挥若定，善于激发全城军民的爱国热情，从而得到全城军民的积极支持。例如，袁崇焕的部下管理屯田的金启□是一个文官，战役开始的时候，他负责战士们的饮食供应，后来，在战斗激烈时，也投入了战斗，最后，因燃放“万人敌”时误被火药烧死。此外，城里的居民，甚至妇女和孩子也都被动员起来，替战士送饭。每当战士杀伤敌人，妇女们就在城上呐喊助威，鼓舞士气。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战斗的猛烈和军民一致团结御侮的情况。正是因为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才能取得宁远保卫战的胜利。

袁崇焕的誓师动员工作很值得一说。他首先采取了刺血、下拜、吃草等一系列不寻常的行动：刺血显示了统帅的决心，足以振奋士气；下拜能使部下感动激奋， 愿意为之效死； 吃草表示自己愿化为牛羊，报答同心死守的将士。其举能激发将士悲愤的情绪。《老子》中有“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之语。“哀 ”，就是悲愤的意思，这对于鼓舞将士的勇气，燃起将士心中敌对的情绪，克制恐惧，特别是摆脱明军屡次失利所产生的对“辫子兵”的畏怯心理，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以上可谓动之真情。袁崇焕负伤以后，他不下

前线，仍然身先士卒，搬运石料，这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将士树立愿意为国捐躯的光辉榜样，以激励士气，可谓喻之以事。接着，他又说 :“别看区区宁远城，几年之后，我们的父母兄弟都要成为金人的奴隶了 。”这一方面指出宁远保卫战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指明宁远战役万一失败的危险前途，使将士懂得为了保卫父母兄弟，维护民族尊严，只有誓死守城，别无其他抉择。特别是用过去无数汉人被金兵屠杀或掳去当奴隶的血的教训，燃起士兵的复仇怒火，使他们奋起抗争，保家卫国。这跟《孙子·作战篇》所说的“故杀敌者怒也”、《九地篇》 所说的“ 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 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可谓晓之以理。袁崇焕通过情、事、理三条渠道来进行战斗动员，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无怪乎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取得辉煌战果。

最后，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一战役的胜利还应归功于正确的战术措施。与袁崇焕同时并且通晓军事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崇祯二年皇太极进攻北京，明朝政府讨论如何保卫京城，是在城上坚守，还是在城外扎营时， 曾经总结过辽东作战的经验。他认为 :“现在守城，全靠火器……过去袁应泰守辽阳，不出一兵，歼敌万余。两者相较，守城是上策 。”思宗采纳了徐光启的主张，作出了守城的决策，皇太极在坚

城大炮之下，惟恐重蹈努尔哈赤的覆辙，不得不放弃北京，转往涿州、良乡骚扰。由此可见，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确是屡行屡效，为敌所惧的。

袁崇焕这一战术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一大创造。因为：1、后金军队久经锻炼，长于骑射，明军战马缺乏，野战训练较差，明军以弱敌强，不得不借助于城堡，凭借有利地形，运用西洋大炮，加强守卫，从而避免对己不利的野战，而强迫敌人攻城，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2、当时比较进步的火器——西洋大炮是明朝单方独有的。到崇祯四年以后，后金才有这种武器。当时后金攻城的方法，只能凭勇敢用云梯攻城，或用高大的战车撞城，派战士在战车的掩护下挖掘城基。如果城堡筑得坚固，城上防守严密，是可以把城守住的。特别是当敌人尚未冲到城下时，可以居高临下，用大炮向密集的敌人轰击，造成敌人的大量伤亡。史书有大炮一发，“糜烂数里”（平射可达十五里）的记载，可见大炮威力之大。这种坚城大炮的战术，对后金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努尔哈赤《兵法》说：“至于城郭当视其可拔者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而不克，反损名矣！”事实上，努尔哈赤在袁崇焕这一新的战术面前，确实损了威名。

这一次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粉碎了敌人进攻宁远和山海关的计划，确保了边境的安全，解除

了首都的威胁；其次是严重打击了金军的气焰，扭转了过去若干年明军屡战屡败的形象，增强了军民胜利的信心。清朝官修的《明史》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袁崇焕始。”清朝人魏源著《圣武记》也说：“崇焕以关外孤城，抵敌十倍之众，卒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可见，即使站在清朝立场上讲话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宁远战役明军胜利的重大意义，给予袁崇焕以较高的评价。

由于宁远保卫战的胜利，袁崇焕的威信更高了，当战事发生后的第十天，捷报传到北京时，本来认为宁远必不可守的人都额手相庆。阉党这时也不能不敷衍袁崇焕，任命他兼任右佥都御史，其他守城将领也都得到奖励。这一年三月，明政府又以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后又被加任兵部侍郎衔。阉党一方面不能不利用他，一方面又派太监刘应坤、纪用出镇辽东，来监视他。袁崇焕虽然上疏，对阉党这种掣肘、削弱边防力量的行为表示严重的抗议，但是阉党置之不理。这时，高第因为不救宁远被弹劾去职。继任辽东经略的是为一阉党分子王之臣。王之臣与高第一样，是个逃跑主义者，始终主张放弃辽东等地。因此，同袁崇焕意见不合。有一次，袁崇焕调动将领，事先没有和他商量，他更对袁崇焕不满。后来，阉党虽然对袁崇焕稍作让步，把关内外的防地作了明确的划分，命王之

臣专督关内，袁崇焕和刘应坤负责关外。但是袁崇焕明了阉党的排挤打击迟早要落到自己身上，恢复大计能否完成毫无把握。 因此，忧虑重重。 他当时写了《偕诸将同游海岛》诗，倾吐了胸中的郁愤：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入深愁。
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

在这首诗里，已经看不到像《边雨》诗那样高昂的情调，而只是忧国伤心时的深沉悲叹。他明白说出了受到牵制不自由的苦况，表示了自己并不是为荣华富贵而来，而是想对边防事业有所贡献，可是自己一片忠诚谋国之心却不为人所重视，而被看作杞人忧天。那么，自己恢复失地的素志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因此每到山川形胜之地，总加深了忧愁。最后，又叹息国家的忧患不在外而在内，因为如果仅仅是边衅，总还可以解决；但是阉党陷害正直的大臣，同室操戈，必将使边患更加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此时他已升任巡抚，在五年之内由一个知县做到封疆大吏，如果是一个贪图功名之人，必然会感到高兴，可是他却因为政局的变化无常，把富贵功名看作梦幻，为内政和边

防的问题而感到苦闷忧愁，这就再一次表明了他热心为国的真挚感情。

他明知这种处境对自己很不利，但是为了保卫边疆，不惜委曲求全。他在《陈辽事治标治本之法疏》中一方面说明自己的作战方略（用辽人宁辽土；且守且战， 且筑且屯；坚壁清野以为本， 乘间击暇以为用）， 一方面要求朝廷对他信用到底，使他能够顺利地按照原定计划，巩固边防，收回失地。这个奏疏上去之后，虽然得到“ 优旨褒答 ”，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得到信任，他的战略思想也不曾得到当权者的真正理解。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八月，努尔哈赤死了。他的诸多儿子为了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第八子皇太极取得胜利，继承了汗位。此时皇太极的政权还是不巩固的。袁崇焕就利用这个时机，派人到后金去试探虚实。 目的是：（一）探明努尔哈赤的死讯是否真实。（二） 了解后金新的统治者对明朝的态度， 以便研究对策。（三）设法离间努尔哈赤的许多儿子， 以便引起他们的内讧， 削弱金人的力量。（四）乘机解决长期作战所必须解决的军粮问题。因为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宁远等四城虽然连绵２００里，但北面是山，南面是海，宽不过４０里。而宁远地区粮食缺乏，必须仿照孙承宗时行之有效的办

法，向锦州一带推进，并移商民大开屯田，才能解决军饷民食的问题，免去后方转运粮食的困难。但是要开屯田，必须修筑城堡来保障。因此，他主张兴筑锦州、中左所、大凌河等城。为了保证城堡能顺利地修筑，不致遭到别人的袭击，他想利用与对方谈判的办法，作为掩护。因此，天启六年十月，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和五台山喇嘛镏南木座（即李喇嘛）以吊丧为名，到后金试探虚实，并约略表示“修好”的意思。事前，他曾把谈判计划向明政府请示过，所以他这样做是秉承明政府的意旨的。派人去后，果然不出所料，皇太极也派人向李喇嘛表示愿意“讲和”。 这样，双方的谈判就开始了。

袁崇焕一面同后金谈判，一面就在这一年冬天，亲自和刘应坤等到锦州、大凌河一带巡察，并派赵率教大兴屯田。他们不断地向东推进，扩大了屯田面积，逐渐恢复了高第放弃的土地。 袁崇焕、 刘应坤甚至魏忠贤都因此受到明政府的奖励。袁崇焕这时又上疏说：“辽东局势败坏， 虽由于人心不稳，但也因为失去险要地形，无从稳定人心。我们军队不利于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法。现在关外四城既已修好，就应该再修松山等城……”

从这道奏疏中可以看出：经过实践的检验，袁崇焕对“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已经充满信心，把它

作为一条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正式向朝廷作了汇报。同时，除了固守原有的阵地以外，他还要继续修建城堡，向松山等地推进，以逐步恢复失土，为将来的战略反攻准备先遣部队和前进基地。这种利用城堡来向前挺进的办法比利用城堡固守阵地又前进了一步。

奏疏呈上以后，朝廷批准了他调拨地方部队前往筑城的要求。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后金因连年用兵，粮食不足，想缓和一下与明朝的关系，抽出力量来向别的方向发展。因此，又遣人来联系“和谈”。这时明朝政府已经将王之臣召回，以关内外专属袁崇焕，命他和镇守太监刘应坤、纪用一并见机行事。袁崇焕看到后金派人来联系，便将计就计，一面派人带着文书去谈判，一面乘机派兵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只是后来形势变化，明政府指令袁崇焕派兵作战，谈判才又停顿下来。

在和谈开始时，对袁崇焕不满的人就乘机大肆攻击。一贯反对袁崇焕的阉党分子王之臣甚至说道：“这是重蹈历史上北宋的覆辙，陷于宋人自愚自误之弊。”其实，袁崇焕的“和谈”不过是“敌人以和谈愚弄我，我也以和谈愚弄他”的策略，目的在于修筑城堡，开辟屯田，以便将来持久作战。既不是消极后退，更不是向敌人乞降。这和北宋统治者自己不敢抗金，又不许人民起来抗击，无耻向敌人献金割地的情

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只要看谈判过程中，袁崇焕坚决拒绝了皇太极提出的“关内归明，辽东（指辽河以东）归金，辽西（辽河以西）城堡不得修筑”，作为缓冲之地的无理要求，而提出了交还辽东，送还被俘官兵等和谈条件就可以知道。

在这次“和谈”中，袁崇焕没有来得及把大、小凌河等城池完全修复，却已把锦州城修好，把宁、锦防线重新建立起来，大致恢复了孙承宗时代的情形。这座锦州城后来虽曾一度被阉党放弃，但在重修以后，一直到清兵入关（１６４４年）的前二年才告沦陷。这是袁崇焕利用这次“和谈”得到的收获。当他为了“和谈”受到攻击，为了分清是非，曾经上疏说明与后金谈判的原因，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一定不能停止筑防，已经召集商民广开屯种，倘若未筑好而敌人已来，势必撤退，那就是功败垂成！所以乘敌人有事江东，姑且以和谈之说作为缓兵之计。敌人来了，则三城已经筑好，战争又在关外４００里外，边防就更加巩固了。”

明确说明了“和谈”是利用缓兵之计，修筑锦州等三城，巩固关外的防御。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明政府虽然“优旨报闻”，但后来这和谈一事，还是被阉党残余用来作为攻击陷害袁崇焕的一个口实。

利用城堡向前推进，大兴屯田，逐步解决军食问

题，雇辽人为兵， 逐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 做到“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以天下复辽东，而不疲天下以事辽东 ”。 这是袁崇焕的恢复大计，也是他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崇祯前期，御史郝晋提出 :“万历末年，综合九边军饷，不过２８０万。现在加派辽饷９００万，剿饷３３０万，业已停止。不久又加练饷７３０余万。自古有一年搜刮２０００万输送京师，又搜刮京师２０００万输送边疆的吗 ？” 确实，明朝亡于民务财尽，而修筑城堡，开辟屯田，不失为救时良策。可惜辽东将帅除了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外，大都见不及此。有的还要把关外拱手让人，有的惟恐开辟屯田，刺激了敌人，不敢有所行动。而像孙承宗、袁崇焕这样的人才，或者有而不用，或者用而不专，或者专而不信。结果，人民遭殃，民族受难，国家亦随之覆灭。反之，如果袁崇焕等始终得到信用，那么辽饷的加派可以渐次减免，人民的负担可以逐步减轻，阶级矛盾可能趋向缓和，“剿饷 ”、“练饷 ”可以不必征收，农民起义的次数就可以逐步减少，明王朝的统治可以延长，满族入主中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由此可见，识别人才、爱养人才、信用人才是极端重要的。

五、宁锦再捷

宁远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袁崇焕就预料金军必然还要再来进攻，而且进攻一定攻锦州和宁远。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

天启七年（１６２７）三月，皇太极知道锦州等三城已着手修筑，惟恐三城修好，明军可以凭险固守，并继续东进。

于是就在这一年五月带领部队进攻明军，想要破坏宁锦防线，攻破山海关，进而直取蓟州，威胁北京。当时锦州城已经修好，总兵赵率教等率领３万人守城。皇太极在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锦州。

袁崇焕在宁远听到锦州被攻的消息，立即派人通知赵率教坚守待援，并且说明城中火器兵马俱备，只要加意防守，敌人决不能攻下。同时上疏说明敌人冒暑深入，其势定不能持久，只要派疑兵出击四处，进行牵制和骚扰，使敌人既不能攻下锦州，又怕后方受到攻击，就必然会被迫后退。他派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精锐骑兵４０００人绕到敌后作战；又调集水师由海道向东出发，牵制敌人的后方；同时，还要加强宁远的守卫。刚好这时有一部分蒙古兵来协助守边，袁崇焕就叫王喇嘛率领他们在锦州附近插上军旗，以助

声威。

金兵进攻锦州的时候，赵率教一面假意同他们谈和，以待援兵；一方面积极布置城防，准备抵抗。皇太极也一面和明监军太监纪用谈判，向守军进行诱降；一面猛攻城的西边，截断明军退路。城上守军从三面集中来援，大炮矢石齐下，金兵伤亡很重，不得不向后撤退，到离城５里处扎营。皇太极一面调沈阳的金兵增援，一面又三次遣使议和。明军也继续施行缓兵计，教他们到锦州来面议。等到皇太极派使者来到锦州城下时，却又闭门不让其入内。第二天，明军派了一个守备、一个千总去说：昨天因为夜里黑暗，不便开城，今天白天可来面议。但等到第二次使者再来，明军还是闭着城门，赵率教站在城上说 :“ 胜败无常，我们只听天命 !” 始终不肯开城与金谈判。皇太极想了许多办法，引诱明军出战，赵率教只是置之不理。皇太极也无可奈何，只好再行攻城，但还是攻不下来。从金兵开始进攻，一直到六月退兵，双方在锦州边打边谈，经过３次大战，２５次小战，金军始终没有能够把锦州城攻破，反而被打死了几千人。

金兵见一时攻锦州不下，又怕明军绕出自己的后路，于是就在明将尤世禄等尚未从宁远出发袭扰自己的后防时，于五月二十八日由锦州分出一部分兵力由皇太极亲自率领进攻宁远，在城北岗扎营。袁崇焕和

副使毕自肃登城固守，把营寨扎在城濠内，城上四周环列着枪炮。总兵满桂等在宁远城东二里列阵，同城上互为犄角。金军想进攻满桂的阵地，但怕逼近城垣，受到城上大炮的轰击，就假装后退，引诱明军出击。明军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坚守壁垒，不肯出击。皇太极毫无办法，准备下攻击令，金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接受上次在宁远城下的教训，齐声劝阻。皇太极说 :“过去父亲（指努尔哈赤）攻宁远没有攻下，这次我攻锦州又没有攻下，都因为攻城比较困难。现在碰到宁远城下的野战军，假如再不能取胜，岂不有损国威，被人轻视 !”就不听劝阻，挥兵进攻宁远城。满桂等见金兵来攻，就在城下和金军展开大战，双方互有伤亡，满桂中箭负伤。鏖战一阵以后，明军为了引诱敌人，退入城内，等金兵追到火炮射程以内时，就用西洋大炮向金军猛烈开火。金军死伤很多，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孙子萨哈剌等都受了伤。袁崇焕此时就在城头上大声呼喊，命令诸将分路追击。诸将听到袁崇焕亲自下令，个个奋勇争先，带领部下向金军猛杀过去，使金兵大受挫折。皇太极没有办法，只好下令退兵。后来，他想，在宁远城下和袁崇焕对阵，不可能捞到什么便宜，弄不好还会重蹈过去的覆辙，就率领部队回到锦州，与留在那里的金军会合，一齐猛攻锦州城南。可是因为锦州城濠深阔，又值天

气酷热，攻了几次也没有攻下，反被城里明军用西洋大炮、火炮、矢石杀伤大量士兵。这样一来，就使皇太极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不得不在六月初五日全部撤退。撤退时，把明军暂时放弃了的尚未修复的大小凌河等城全部毁掉。宁锦保卫战至此就以明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当时人们称这次胜利为“宁锦大捷”。

锦州被攻以后，袁崇焕曾向朝廷送上《奏报宁锦情形疏》。疏中分析了明军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说明野战是金军所长，明军不宜在野外邀击，只宜凭城坚守，以大炮轰击。目前锦州已击死金兵数千，如果武器粮食充足，即使敌人再次围困也不成问题，但恐怕后金反客为主，从沈阳出兵轮流阻击明朝援军，长期围困锦州守军，那才是难以对付的。因此，根本的问题是提高军队的野外作战能力。袁崇焕此番话语可以说是知己知彼，熟谙军情。后来，清兵在１６４２年就是采用这种办法把锦州攻下的，这就说明了袁崇焕是有军事上的远见卓识。由于他早已看到明军的弱点，所以一直注意加强军队的野战训练。因此，此次战役与上次宁远保卫战的情况就有所不同。自明朝与后金开战以来，虽有宁远大捷，却未曾敢与后金“合马交锋”。袁崇焕在《宁远报捷疏》中曾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合马交锋。即去年亦

从城上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拼命，臣复凭堞大呼，令分路追击，诸将忿恨，一战挫之 。”由此可见，在袁崇焕平时的训练和战时的鼓励下，明军的野战能力和作战勇气，较过去大大地提高了。这标志着明朝的防御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从消极的缨城固守，转为刀枪相见的积极抵抗。这次大捷更加增强了广大军民保卫关外、恢复失地的信心，也充分显示出宁锦防线坚强有力的抵抗作用。

这一次战役，历时一个月，金军攻城不下，野战不胜，受到极大挫伤。正如皇太极所说“ 损了国威 ”。这是明军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捷。这也充分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领导，明军是能够把金军打败的。

经过这一次战役，这一条重新建立起来而又经过考验的宁锦防线，就成为明朝东北边疆上的一道坚固的屏障，使金军无法越雷池一步。如果袁崇焕长期负责东北边防，那么，逐步收回失土，恢复辽东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时正是阉党势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魏忠贤一向恨袁崇焕不肯依附自己，实在不愿意让他长时间地在此要职上就任。过去，因为边防吃紧，不能不利用他一下，现在看到连续取得两次胜利，边疆形势稍微巩固了一些，就开始排挤他了。在宁锦大捷以后，魏忠贤等加恩三等，甚至３岁的魏良栋、２岁的魏鹏翼也封侯封伯。而宁锦大捷居首功者袁崇焕因一

向“不为魏忠贤所喜”，而没有被叙功封赏。不但没有被叙功封赏，还被魏忠贤的党羽御史刘应坤弹劾，诬蔑他不救锦州，是因为“暮气难鼓”。袁崇焕听到这个消息，知道自己是非走不可了，于是不得不乞休辞职，称病请求退休，丢下了他花了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宁锦防线，离开6年来一直用心守护着的东北边疆，七月里踏上归家之路。他在辞别辽东时所作的《边中送别》一诗（见前），寥寥数语倾吐了他杀敌雪耻，一心报国的高尚情怀，表现了他处处以国事为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的情操。

他此时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失土还没有恢复，国耻还没有洗雪，然而却又不能不走。此种矛盾的心理，也反映在他的一些诗中。当他回到家乡，经过庾岭时，曾作诗说：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
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
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
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在这首诗中，他明白说出自己不得已而还山的苦衷。同时表示他并不追悔过去以身许国、立功塞外的行动。由此可见，即使在被排挤以后，他仍旧忘怀不

了边防事宜。从结尾二句还可以看出他虽然曾任封疆大吏，但是宦囊萧索，两袖清风。除数卷封章以外，依然书生本色。跟上次落第归来，初无二致。

袁崇焕离去后，阉党仍以王之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这个逃跑主义者到此时居然还学高第的做法，撤去锦州的守备，专守宁远，把袁崇焕和广大军民用血汗换回的疆土，再次拱手让与敌人。结果，锦州城竟被金军毁去，幸亏不久，熹宗死了，思宗即位，袁崇焕再被起用，才把锦州第二次收复过来，并且把城重新筑好。

宁锦防线得人则存，失人则亡。说明边防将帅是否得人，极关重要。否则，即使有了物质上的长城，也只能拱手与人，为敌人所利用。

六、诛毛文龙

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即帝位。

朝臣乘机，对作恶多端的魏忠贤及其党羽群起而攻。崇祯这位主观上很想有所作为的明朝末代皇帝，十一月诛杀了恶贯满盈的阉党罪魁魏忠贤及其主要党羽。同时，“廷臣争召袁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三月，罢王之臣。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河北、山东的军事防务。袁崇焕连疏请辞，未被批准。

七月，袁崇焕进京受命，向思宗面陈方略。他周密地估量了敌我态势的发展，曾向思宗说：“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提出了复辽的宏伟计划。为此，以以往弊政为鉴，进一步奏明实现复辽大事，须以通力合作为前提，恐怕政府部门不能和他密切配合，甚至从中阻挠破坏，所以特别提出要求：“五年之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鉴于“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拘，不得其志”的历史教训，袁崇焕精密地预计了前途可畏，面

对皇帝，力陈衷言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 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思宗听了，感动地站了起来，安慰说 :“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并且通知四部主管官员，要求他们保证袁崇焕的要求能够实现， 接着，“收还（王）之臣、（满）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 ”，给了他先斩后奏的大权。心怀知遇之恩的袁崇焕，为慎重起见，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请求皇帝正式批准，以便取得合法地位，能够顺利地按照计划执行，毫无疑虑地把辽事方略和可能出现的危难、苦衷，无疑地陈于明君 :“恢复疆土大计，不外乎我过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说法。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些，我与手下众将士是可以做到的。至于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都至尊司其个人职责范围，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驾驭边臣与朝臣不同：军队中可惊可疑的事情很多；只应当谈成败的大局，不应当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崇祯听了这位临行前的名将一席忠心、深沉、悲切、辛酸的由衷之言，当即“优

诏答之，赐蟒、玉、银币。（崇焕）疏辞蟒、玉不受”奔赴辽东而去。重读３００多年前的这番充满哲理和预见，“字字血，语语泪”的话语，结合行将扑来的际遇，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自然地付予无限的心酸。

在天启六年，袁崇焕已经上过奏疏，要求朝廷信任他。这一次又在刚即位的思宗面前再次提出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相关问题：１１ 恢复失土，只能渐进，不能速取。２１ 用辽人守辽土，用辽土养辽人，解决兵饷两缺的问题，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以利持久作战。３１ 贯彻“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基本战略方针。所谓“守为正著，战为奇著 ”，就是一般的采取守势，有隙可乘时采取攻势。也就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采取守势，等到敌我力量发生变化，或敌人有了弱点，再进行战略或战术上的进攻。所谓“和为旁著 ”，就是利用和平谈判作为军事行动的辅助，目的还是为了恢复全辽。４１ 在国君与边帅的关系上，希望国君只管成败的大局，不在细微末节上苛求，以建立国君与边帅的正常关系。５１ 信任边帅，防止敌人用间。袁崇焕之所以如是思量，当然是为了在战略问题上和朝廷统一认识，从而得到思宗与朝臣的了解和信任、配合与支持。因为几年来的事实告诉他，由于政治混乱，党争激烈，已经牺牲了熊廷弼，挤走了孙

承宗，贻误了边疆防务，给敌人造成了有利的机会，自己在前些时候，也同样受到排挤。现在阉党虽然失败，但残余的阉党还没有肃清，他们还在等待机会进行活动。自己在被召回以后，一方面要同金人斗争，一方面还要同阉党的残余势力作斗争，而且越是勇猛克敌，越是受到敌人的仇视；越是奋迅立功，越是遭到反对的人的妒忌。如果边外的敌人利用朝臣的不团结，来进行离间，朝中的反对者又乘机进行攻击，那末自己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很可能像熊廷弼那样无辜被杀。这一点，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后来果然死于敌人的反间和朝廷内部的党争，当时他几乎已经预料到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敏感性与预见性。

袁崇焕在取得中央支持后，于八月初抵达关外。当他听说了宁远饥兵哗变的事情以后，亲自飞驰至广宁，决定借此以整肃军队。他“斩知谋中军吴国琦”及“宥首恶杨正朝、张思顺， 令搏十五人戮于市”；严厉斥责负有责任的参将彭簪右、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奖励惟独“不从变”的都司程大乐及其所部。从而，化乱为治，化险为夷，“一方乃靖”。随即他又派兵加强了辽河沿线的守卫。

八月二十二日，后金进犯黄泥洼，袁崇焕派祖大寿把金兵击退。这次战役，明军斩首１８０级，获骡

马１２０匹，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袁崇焕初到关外，就努力贯彻五年平辽方略，着手统筹全局，整顿防务，厘定军制，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当时，关内外有好几个巡抚和总兵，事权不一，有指挥不灵之患。袁崇焕请合宁远、锦州二镇为一镇，派总兵祖大寿驻锦州；提升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和自己一起驻宁远；移蓟镇总兵赵率教驻山海关。关内外只设两总兵。又请停辽东、登莱巡抚，以减少层次。于此，统一了事权，使用了良材，这也增强了袁崇焕自己的信心。他满怀信心地说：“臣自期五年（复辽），专藉此三人！”

由于王之臣事辽期间，“以辽左屯政久坏（为由），改兵屯为民屯。未几，复弃锦州，退守宁远；加上皇太极对蒙古族施行笼络政策，致使锦州外围“向受（明朝）抚赏”的蒙古哈剌慎诸部动摇于金、明之间。崇祯元年，辽东“岁饥”，哈剌慎三十六家……有叛志”，加深了对宁远前线的威胁。袁崇焕到任后，亲自“诏诸部头人于边，亲抚慰，（众）皆听命”。从而孤立了后金，巩固了锦州防线。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正月和闰四月，后金曾两次渡过辽河，作试探性的进攻，都被袁崇焕派兵击退。因为打退了进犯敌人，保卫了疆土，使“神京晏如”，袁崇焕受到了朝廷的奖励，晋升为太子太保。

袁崇焕在精减了内外的一些冗员以后，又进一步和赵率教、何可刚等商量整顿宁锦、天津、登莱……等镇的兵制。制定联防计划，以便协同动作，合力攻守。可是有一个长期盘踞在辽东沿海一带私与后金往来的都督毛文龙，不听指挥，无法整顿，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这件事，袁崇焕和朝中辅臣钱龙锡反复磋商。磋商的结果，认为“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并且商定：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只有用“入其军，斩其帅”的霹雳手段解决他。

出身“无赖”，“潦倒行者二十余年”的毛文龙原来是个都司。天启初年率兵援助朝鲜，后逗留辽东。曾乘虚袭击镇江，兵败后逃至皮岛。皮岛亦称东江，在辽宁南大海中。毛文龙在皮岛统治着由陆地逃来的军民，成为一个据地自雄的军阀。后来，他用钱财贿赂朝官，并拜魏忠贤为义父，扶摇直上，被提升为总兵，加左都督衔，得尚方宝剑，挂将军印，其防区是旅顺以东沿海一带。这里北靠后金，南接登莱，可牵制后金的后方，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毛文龙本人毫无将略，曾经多次被金兵打败。开镇八年，没有收复一城一地。平时冒领大量军费，克扣兵饷，朝廷派监司稽核，拒不接受。又杀降人难民冒功，劫掠商民，贩运违禁物品，以大量物资供应后金。还曾以索饷为名，公然带兵到登州，大肆抢掠。并且说过

“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的话。实际上他不但骄横跋扈，而且是一个野心极大的民族叛徒，曾准备反叛明朝投降后金。他在崇祯元年写信给皇太极，询问投降以后，可以得到什么待遇。又曾同皇太极约定：金取山海关， 他取山东，夹攻明朝。事成之后，“我（毛自称）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 ”，想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王国。还曾向皇太极表示，要建立大功，归顺后金。虽然这些内幕，袁崇焕不可能完全了解，但是内外诸臣都认为毛文龙是国家大患，纷纷加以弹劾，只是因为他拥兵海外，鞭长莫及，朝廷对他无可奈何。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为了整肃军纪，建立统一指挥系统，巩固前沿阵地，减轻国家军费负担，决意处置这个强横的军阀，作为实施平辽方略的第一步。就以阅兵为名，引诱毛文龙到旅顺西北、金州西南１５０里海中的双岛来会见，出其不意地把他处死了。

当袁崇焕在六月初一日与毛文龙相见时，本来还想争取他，同他商谈了好几天。对他说 :“辽东海外，是我们两人负责，务必同心共济，才能成功。我现在有一个建议，不知你能否采纳 ？” 毛文龙当即显出不高兴的神色，袁崇焕又说 :“现今皇上圣明，我们应该勉力疆场 。”毛文龙更加不快，只说熹宗怎样怎样对他好。袁崇焕问他平定辽东的方略怎样。他说宁

远的兵马都没有用处，只要用他的部下二三千人伏在隐蔽处放一把火，就能把金兵赶跑。袁崇焕听了，很是诧异，接着又劝他改定营制，服从指挥，设立监司。毛文龙怫然不悦。袁崇焕见他不肯，就劝他回乡，说："朝廷念你数年辛苦，该有人来接替你。"毛文龙傲慢地说："这个地方谁接替得了！"袁崇焕见他执迷不悟，就没有再说下去。

六月初四日，袁崇焕发给毛文龙部下饷粮，又把带来的１０万两银子交给毛文龙部下的官员收管。初五日又派人通知毛文龙：以后旅顺以东，用毛文龙印信，以西用督师印信。接着，袁崇焕传令部下兵士上山，比箭领赏。毛文龙来问袁崇焕何日动身，袁崇焕说："宁远重地，不能久离，明天就去。现在请你略事盘桓，上山观射。"毛文龙答应了。这时，袁崇焕已命令部下在山上设置了帷幄，并且教参将谢尚政预先布置了伏兵。毛文龙来时，随从兵卒，一概不准进入帷内，只有随从官员１００多人跟着。等毛文龙等上了山，谢尚政就暗传号令，把毛文龙及其随行官员围在帷内。

袁崇焕在山上问毛文龙随行官员姓名，都说是姓毛。毛文龙说："这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说："你们勤劳海外，每月只有一斛月米，言之痛心！希望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不愁无饷。"各官员都表示

感谢。接着，袁崇焕就责问毛文龙为什么不肯改定军制，接受兵马钱粮的稽核。毛文龙还想狡辩，袁崇焕厉声说道 ：“我披肝沥胆，同你谈了几天，总希望你回头是岸。岂知你狼子野心，只想欺诳抗拒。目前皇上励精图治，国法岂能容你 !”说罢，就叫人除去毛文龙的冠带，把他捆绑起来。毛文龙还很倔强。袁崇焕当时宣布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 ：（一）专制一方，兵马钱粮不受稽核。（二）杀降人难民， 冒取功劳。（三）曾说 ：“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的话，大逆不道。（四）克扣军饷，侵盗军粮。（五）擅开马市于海岛， 私通外蕃。（六）擅自委派高级军官，副将以下达１０００余人。（七）剽掠商船， 自为盗贼。（八）强娶民间女子，部下纷纷效尤，人民不得安居。（九）强迫难民到辽东窃取人参，不愿去的，就让他们饿死岛上， 白骨如山。（十）运送金宝到北京，拜魏忠贤为义父， 塑其冕旒像于岛中。（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数，掩败为功。（十二）开镇八年， 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毛文龙听了以后，吓得丧魂落魄，而又无可争辩，只得叩头乞免。于是，袁崇焕对毛文龙的官员说 ：“毛文龙有这样大的罪恶，你们说该杀不该杀？ 我今天如果错杀了他， 你们就上来杀我 !”随从官员大都相顾惶然、恐惧失色，不敢作声。只有个别人说毛文龙数年辛苦，请求开恩免死。袁崇

焕怒斥道 :“毛文龙本来是一个布衣，现在官居一品，满门封荫，已足以抵偿，怎能容他这样悖逆 !”说罢，袁崇焕就转向西方，朝着遥远的北京朝廷，一面叩头，一面说 :“我现在杀毛文龙以整肃军纪。今后诸将中有像毛文龙这样的人，一律处死。我如果不能恢复失地，将来皇上也像我杀毛文龙这样杀我 。”于是请下尚方宝剑，令水营都司赵一枝、何麟图为监斩官；令旗牌张国柄用尚方宝剑把毛文龙杀了。接着又向毛文龙的随从官员宣谕说 :“今天只斩毛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军民， 其余无罪。我杀人的目的， 原在安人。你们各人照旧工作， 恢复本姓，为国效力， 不必惊惧 。”随即吩咐把毛文龙的尸体交给他的亲属备棺收殓。这时，毛文龙部下的健校悍卒，一方面因为袁崇焕的军队严整，无懈可击，不敢反抗；一方面又因为毛文龙平日虐待部下，不得人心，因此，谁也不愿意为他拼命。所以，在杀毛文龙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发生什么变故。六月初六日，他前往毛文龙灵前“具牲醴拜奠”。说道：昨天斩你是因为朝廷的法律，今天来祭奠你，是因为同为阁僚好友，出于私下的交情。并为此而泪下。

杀了毛文龙以后，袁崇焕把毛文龙的部下２１８万人分为四部。交四将统率。又把部分水师改为马步军，一起加紧操练，准备同宁锦部队协同作战，以收

“捣剿夹击”之效。同时他又晓谕安抚各岛，除去毛文龙一切虚政，释放无辜的狱中囚犯以及被掳掠来的商人几十名。

至此，经过一番整顿，宁锦等数镇合起来，共兵１５１ ３万有余，马８１ １万有余，岁费经费４８０余万，节省开支１２８万。达到了建立统一指挥系统，减少军费开支的目的。

毛文龙原来是一个贪虐跋扈的阉党分子，曾经有多方面的人揭发他的罪状，但因他拥兵海外，朝廷也拿他无计可施。袁崇焕用计把他除去，是为国家除去了一大隐患，为整顿边防扫清了障碍，为辽东沿海人民解除了桎梏，既表现了他机智勇敢的非凡才能，也表现了他敢作敢为、勇于负责的精神。但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就难免擅杀之罪，要受到思宗的怀疑和反对派的攻击；反过来，如果被毛文龙杀了，又会被说成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况且他和毛文龙并没有私仇，如果不是忠诚谋国，岂肯甘冒这样的风险，干这样的傻事？但是袁崇焕并不考虑这些，并不因此谨慎保身，消极避嫌，还是毅然决然地为国家除害。当他杀毛文龙的时候，他的中军何可刚曾对他说 :“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 。”这一点他的心中是完全明白的。然而他宁可杀了毛文龙，然后向思宗请罪，等待处罚，却决不肯姑息养奸，为

国家留下后患。可是后来他竟真的因此被怀疑，被攻击，乃至被杀害，这实在是莫大的冤屈。

但是，杀毛文龙时，毕竟因为时机紧迫，没有来得及请求思宗批准，也就没有经过合法的手续。这样，袁崇焕难免被人攻击，说他有擅杀之罪，也难免受到崇祯的怀疑。所以，他在杀了毛文龙之后，特地上疏说明原委，请求思宗追认。他在疏中说：“请旨而出海行诛，则陈汝明等（毛文龙的党羽）潜伺京师，机一泄而贻患无穷，非便也。欲执之还朝，叫文龙以无旨抗拒，……深入其军，擒之可出乎？……遇此无可如何之人，当此无可如何之际，惟有出其不意，擒而戮之，以请死于皇上。”这个说明；虽然暂时得到明政府的谅解，由思宗追认为其做法合法，说了“文龙通敌有迹，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咎”。等等的话，后又传谕天下，宣布毛文龙的罪状，以安袁崇焕的心。但是，在明朝那种专制主义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必然会发生君权与将权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这对矛盾还会激化起来。袁崇焕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未经皇帝批准，擅自杀戮大将，在思宗看来，这就侵犯了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何况思宗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疑心颇重的人，当然心中不免有所怀疑，同时也定然在心中存在着不快。后来，阉党残余看透了

思宗的这种心理，又乘机以此为攻击东林、企图翻案的借口，使朝廷内部的党争重新尖锐起来，于是埋下了袁崇焕后来冤死的祸根。

袁崇焕后来被杀与五年平辽的方略亦有一定的关系。关于平辽之说，据《国榷》记载，是思宗问袁崇焕：“建州何日可平？”袁回答说：“以五年为期。”这句话当时就引起许多议论：有人认为袁崇焕大言欺罔，料定他不能成功；有人认为他向来把事情看得简单，只是随口答应，并没有深思熟虑过此事。而后来阉党残余则抓住这句话，诬蔑他为了结束五年平辽之局，而引敌胁和，欲置之于死地（其实这话才说过一年，距离五年尚远）。袁崇焕久历边疆防务，当然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方略。过去历次上书已言其梗概，此次被重新起用，更会认真考虑，甚至在陛下面前，他已经准备好回答思宗的问题。因此，他这么说，绝不是大言欺罔，也不是随口应答。如果按照他的方略行事，五年收复金辽，并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战略、战术对头，朝廷信用，将士用命，军民团结，形势的发展比预料的还快）。当然，由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条件，要看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对于战争各个阶段的时间，在袁崇焕心中本有一个粗略的估算，而在魏忠贤伏诛之初，朝政一新，思宗又极像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因而增强了袁崇焕的信念。他又是一

个富于感情的人，很感激思宗对他的信任和拔擢。当他看到思宗殷切期望平定辽东时，就把心中的话倾吐出来，意在加以宽慰。及至给事中许誉卿问他五年平辽有无充分把握时，他才想起需要补充说明努尔哈赤经过四十多年的经营，已有相当的基础，要收拾这一局面，本来并不容易，但皇上殷切期望，自己怎么忍心诉说困难？五年之中，必须中外事事相应，乃能成功。并且指出“法在渐不在骤”，也就是说不可能速胜。但是在这一方面强调得还不够，在不懂军事而又性情急躁的皇帝心中没有留下必须持久作战的印象，这对以后事态的发展有很不利的影响。

七、驰援京师

天启末年，袁崇焕实行款西拒东的方针，蒙古各部与明军配合得较好。自袁崇焕去职以后，明军失去得力的将领，与蒙古各部的联络中断。蒙古内部也彼此倾轧，其中势力较强的察哈尔部用兵于素有仇隙的喀喇沁部，同时为了躲避后金的压力，倾巢向西进发，并在宣、大地区进行骚扰。

宣、大明军诱杀了察哈尔部使者，崇祯上台伊始又革除了蒙古各部的赏额，因而明廷与察哈尔部剑拔弩张。而喀喇沁等部因受察哈尔部的欺凌，又相继投靠后金皇太极。于是蓟门一线藩篱尽撤，京师北面的门户暴露无余。

后金皇太极即位以来，重视调整满汉关系，逐步改变了天命年间将汉兵、汉民沦为满人奴隶的政策，对归降的汉人不杀不辱， 分配土地，妥善安置。 放宽了其父努尔哈赤制订的汉人逃亡统统处死的“逃人法”。 他还严肃立法，对劫掠降民财物、草菅降民性命的满人给予重罚。皇太极启用汉族文人，参照汉制设立国家各级机构，学习汉族统治经验，要求臣下凡事都要照《大明会典》去办，改变了他父亲单纯依靠马上打天下的作法，这一切都加速了后金社会的封建

化，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政权，发展了后金的经济，使八旗兵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以上情况表明，袁崇焕再次督师辽东时，形势异常严峻。

对于蒙古诸部，袁崇焕极为重视。他向崇祯皇帝建议起用王象乾专责察哈尔部抚赏，崇祯皇帝接受了袁崇焕的建议。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四月，察哈尔部与明王朝重归于好，届时该部迁徙宣、大边外，虽然起不到蓟门藩篱的作用了，但起码使明军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对于喀喇沁部，崇焕深知其穿连辽、蓟，经道惯熟，若导后金入犯，则东从宁前，西到喜峰，处处可虞。当时该部旱荒，要求明朝开米市遭到拒绝。袁崇焕允许开米市，将明军自己都告缺的粮食接济喀喇沁部，并且亲自劝告该部首领，不要背明投金。该部首领指天为誓，以妻儿为质，保证不作后金向导。可是后来喀喇沁部竟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这是袁崇焕所没有料到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袁崇焕此次出关确也有失策之举。

首先，袁崇焕对其敌手皇太极的智谋和胆略估计不足。他曾说，努尔哈赤不过是个狡猾的强盗，皇太极不过是个慓悍的强盗，没有真本事，得辽土而不肯据，得辽人而不得用，比不上历史上的阿骨打、刘聪、

万勒等人。只要按以往方针行事，五年复辽就能实现。其实，如上所述，皇太极已经逐渐改变了其父与辽人为敌的政策，在军事上也吸取了两次败于坚城大炮的教训，探索着对明战争新的适合的战略战术。

其次，由于轻信了喀喇沁部的诺言，袁崇焕便没有着力经营蓟门一线的防务。袁崇焕将原任蓟镇总兵赵率教调到山海关，这对蓟门无疑是削弱。

袁崇焕出关后，皇太极与其互有使者、信件来往。这次持续半年多的和谈系皇太极主动。这期间后金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蒙古诸部方面，一则对察哈尔兴师征讨，一则对喀喇沁等部从容笼络。这体现了皇太极欲越关、宁而伐明的战略意图。袁崇焕一方，由于重整防务的需要，也确实无力主动进攻，因此也想以和谈缓兵。但他曾请示阁臣钱龙锡及兵部尚书王洽，未获准允。所以袁崇焕对和谈只是被动应酬，抓紧时间，积极备战。

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九月以后，后金的势力扩张到内蒙古一带。明朝东北边外的广大地区基本上都为后金所控制。因此，后金很有可能绕过山海关，取道内蒙古，侵犯明朝边疆，甚至威胁北京。当时总理蓟辽保定军务的刘策并没有作必要的准备，北京附近的军事重镇蓟州的防务极为空虚。为统筹全局起见，袁崇焕除了加强自己所辖的宁锦等地的防务以外，还

在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四、五月间上疏朝廷，大意说的是 ：“臣在辽东，辽东不需要顾虑，只有蓟门单弱，敌人可能来攻我们的弱点，请求严令蓟门加强守备，这是今天第一要着 。”又指出蒙古可能做后金的向导，帮助后金来攻明朝。可是明政府不以为意。袁崇焕连上三疏，反复说明，思宗才把这件事发交朝臣讨论，但是还是拖延不决。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十月，皇太极亲自统率大军大举进攻明朝。由于宁锦防线巩固，金军曾遭过两次失败，所以皇太极率领后金并告谕已归顺后金率兵而来的蒙古各部军队几十万人，以熟悉路径的喀喇沁部的队伍为前导，取道今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大举攻明。后金兵分两路向遵化北面的龙井关、大安口等隘口进发。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关连克，后金进入长城，左右两翼大军会师于遵化城下，明朝廷才得知消息，京师全城戒严。

早在同年九月，袁崇焕即得到后金将要渡辽河西犯的情报，他曾派部将谢尚政领兵一支援蓟，却被蓟州巡抚以消息不确为由遣其回师。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正在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中后所，听到金兵越关、宁而攻入的消息，心胆俱裂。他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骑兵４０００急速增援遵化，赵率教行军三昼夜，走了３５０里，抵达三屯营，被总兵朱国彦所阻，

不能入营。赵率教只得策马向西，路上同后金督粮兵相遇，赵率教挥师进击，把后金兵打败，并杀掉金将卓尔纠。十一月初，赵率教在遵化战役中不幸中流矢阵亡。遵化城因为守将布置失当，随即失陷，三屯营也被后金攻破。

袁崇焕在赵率教出发后，立即调动马步兵两万人，于十一月初四日亲率领锦州总兵祖大寿、中军何可刚等继续入关增援。沿途经过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等地，都留兵驻守，目的是便于将来堵截金军退路。袁军六日疾行５００里，在十一月初十先敌抵达蓟州。不料遵化已于初三日陷落，巡抚王元雅自刭，赵率教殉国。

思宗听说袁崇焕率兵来援，很是高兴，下旨嘉奖，拨款慰劳将士，并令袁崇焕统率诸路援军。

这时，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军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军顺义；宣镇总兵侯世禄先驻军三河，后移驻通州。袁崇焕令尤世威仍回昌平保护皇陵；令侯世禄仍回三河，为蓟州后应；令满桂到北京去守卫国都；却由自己的部队独挡大敌。袁崇焕这样部署的原因是：看到这几路军队，既缺乏训练，装备又差，把他们分开来还可以壮壮声势，互相接应；合在一起，则一军战败，也势必影响其他各军的士气。这样安排原有其不得已的苦心。不料后来，却被人误解为“遣散援军”、“纵

敌不战 ”，因而，引起了思宗的怀疑。

十一日后金自遵化向京师进发。十二日，袁崇焕所率辽军与后金前哨遭遇于离蓟２０里之马落桥，一战挫之，颇有斩获。袁崇焕知道敌人后队就要来到，就宿在东城等待敌军，欲与后金在此决战。十三日，敌军大队到达，驻扎在蓟州东南角，同袁军相持半日。金军本来就想避免同袁军作战，所以绕道而来，想不到在此又遇到袁军，所以在刚同袁军相遇时，都“ 相视而骇 ”。 然而皇太极却不恋战，金军因前锋受挫，为了避坚攻弱，就在夜间退去，由蓟州向西而去。沿途遇到满桂、侯世禄的军队，把满、侯两军打败，并且在攻陷三河、顺义以后，直逼通州，企图威胁北京。

袁崇焕听说三河、顺义已经失守，又知道北京附近没有劲兵守卫。为了保卫国都，袁崇焕再督将士由蓟州抄小路向西急行。部将们担心，军队没有朝廷的命令而直趋京城，会遭到猜忌。袁崇焕说 :“ 皇上有急，还顾得了那么多，如能解难，虽死无撼 。” 一路上，兵不进食、马不停蹄，两昼夜走了３００多里。他严令战士秋毫无犯，有一个士兵擅自走进民宅索要饼吃，袁崇焕将其枭首示众，以安民心。十七日，辽军抵左安门，袁崇焕下令，不许一兵一卒私入民家，连野外树木也不得损伤。此时，崇祯皇帝已将兵部尚书王洽下狱，正为京城防守而焦急，闻袁崇焕率辽军

先至，深感欣慰。

金军乘夜向西退去以后，盘踞在通州附近，本想把袁军隔在后面，使袁崇焕不能来增援北京；同时又可以进据通州，扼住北京的咽喉，切断北京和南方漕运的联系。皇太极认为这样一来，北京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谁知这一招被袁崇焕识破，袁军早已由近路飞奔到京郊，使皇太极这一招落了空。当金军在高密店一带发现袁军已经到了他们前面时，大出意外，认为袁军从天而降。后来，金军到了北京附近，已经在袁军后面三天了。可是袁崇焕这一积极保卫京师的敏捷行动，后竟被人诬陷为引导敌军逼近京城，威胁朝廷讲和。

十八日，思宗召见袁崇焕加以慰劳，问他战守方略，并赐军队饮食及貂裘、羊，又令户部发军饷。这时，袁军已经忍着饥饿两天了。十九日，思宗再发刍豆粮米、羊、酒、银饷犒师。

二十日，后金八旗大军始达京师东、北两面，在城北土城关列营。这时，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后侯世禄率援军列营德胜门，袁崇焕、祖大寿列营广渠门。皇太极命大贝勒代善等领右翼军趋德胜门，大贝勒莽古尔泰等左翼军趋进广渠门。两场剑与血的鏖战几乎同时打响了。德胜门战场上，侯世禄不敢迎敌，先行溃败，满桂率兵交锋、孤军奋战，城上守兵发炮配合

助战，不料误伤明军甚多，满桂负伤，带残兵避入城中。

袁崇焕在广渠门西排兵布阵，祖大寿扼守南面，王承胤列西北面，自己率兵居正中，严阵以待，以品字形队列迎击来自东北的八旗兵。两军交锋，短兵相接，奋力殊死。金军一部由皇太极长子豪格率领，首先进攻袁军北面，在打退袁军伏兵后，追至城濠附近，被袁军所阻。金军的护军校台弼善继续前进，被袁军打死。此时，金将阿济格、阿巴泰、多尔衮（均为努尔哈赤的儿子），又用尽全力向袁崇焕的中军猛扑，想一举击溃袁军。袁崇焕也指挥战士奋勇杀敌，双方展开了猛烈的战斗。在战斗过程中，袁军副总兵周文郁两肋中了许多箭，像个刺猬一样；袁崇焕也被射中了几箭，幸亏身上披着数重铠甲，不曾射穿。有一次，敌人的刀已经砍到袁崇焕的身边，亏得有人拿刀将敌人的刀隔开，袁崇焕这才没有受到伤害。袁崇焕身先士卒，袁军将士越战越勇。以往军士杀敌论功，每凭首级，而常以争割首级而误战。袁崇焕深以为鉴，战前即令：不许割级，惟尽歼为期。故众将士此时一意剿杀金军。后来，袁崇焕同祖大寿合兵，进行了反击，进攻金军后队莽古尔泰部，八旗锋芒始却，金军不支溃退。明军乘胜砍杀，追出十多里，一直到辽河边上，金军慌忙渡河。渡河时，骑兵陷在冰里，淹死无数。

袁军又乘胜斩首１０００多级。

这次战役，自午时起至酉时止，两军血战六七个钟头，八旗兵被歼数以千计，使金军锋芒大挫，明军亦伤亡数百。袁崇焕连夜慰劳负伤将士，直至东方欲晓。皇太极曾叹息说 :“１５年来，不曾碰到这样的劲敌（这次袁军以寡敌众，野战规模及作战成果都超过了宁锦战役，说明袁军的战斗力又有新的提高，能够和金军争强斗胜，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也 !”

崇祯皇帝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９０００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军又攻左安门，被袁军夺了攻城器械，杀了一个头目。金军只好放下北京不攻，退兵到南海子一带。北京形势稍微缓和下来。同一天，袁崇焕又派向导任守忠率领５００人带着炮袭击南海子，金兵被吓得逃掉很多。在此期间，袁崇焕因部下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曾请求入休外城，思宗不许。袁崇焕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原因是：11 休养士卒、以逸待劳，且避免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野战。21 加固城防，踞高临下，敌如攻城，即以大

炮轰击。31“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待敌人松懈疲惫，我各路援军齐集，内外夹攻，使金军前阻坚城，后无退路，终遭惨败。这样的作战方略本来是正确的，谁知竟被思宗怀疑为心存异志，而成为后来被杀害的罪状之一。

由于袁崇焕兼程赴援，只带了骑兵９０００人，步兵还落在后面，不能跟上，以９０００人抵抗１０余万大军，实力相差太远，根本不能同敌人展开决战。可是明政府在慌乱之中，每天催促他快些出战，想尽快将敌人赶跑。袁崇焕为了避免不利的决战，决定等到十二月初三、四步兵赶到，再一举歼灭敌人，所以持重不发，不料还没有等到步兵赶到，这位忠诚谋国，千里赴援的袁督师，就于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召见他时，被逮捕起来，而且后来竟遭冤杀。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给当时的战争局势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如上所述，袁崇焕在这次反抗后金入侵的战争中，不但自己直接守护的防线非常巩固，使敌人无隙可乘，不敢侵犯；而且能事先看出问题，提出警告，更能主动地入关增援，以少数兵力抗击１０余万敌军，取得相当大的战果，使北京局势相对地稳定下来。这和刘策的疏于防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以及侯世禄等遇敌即行败退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袁崇焕不但无罪，而且有很大的战功。至于他不愿意按思宗的命令在不

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以免遭受损失，影响整个战争局势，而主张等待援军齐集，敌人暴露弱点时歼灭敌人， 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万全之计。《孙子·地形篇》不是说过“ 战道不胜， 主曰必战，无战可也 ”，《谋攻篇》不是说过“ 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的话吗！再就整个战争形势而论，敌人孤军深入，利在速战，明军则利在持久。这一点只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皇太极入侵途中，他的弟兄代善和莽古尔泰等都曾加以劝阻，理由是 :“ 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粮匮马疲，何以为计？纵得入边，而明朝方面会各路军环攻，则众寡不敌；倘从后堵截，恐无归路 。” 可见，皇太极的这一军事行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是绝对不能持久的。如果袁崇焕能够继续这次战役，把他的正确主张贯彻下去，那么后金的军队很可能遭到代善等所说的惨败的结局。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袁崇焕被捕后战局的演变就可以知道。起初，满桂受命为武经略，统领诸军。因援军未集，朝廷促战，结果一战阵亡。其他如祖大寿、麻登云、黑云龙等几个总兵或死或被擒，明军一败涂地。金将纷纷向皇太极建议进攻北京，皇太极说：取北京易如反掌，但明朝地广人多，还有防御力量，不会一下子土崩瓦解。恐怕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整练

兵马， 侍机再举（实际是怕城上大炮的轰击）。于是在北京郊区以及良乡、寿山、固安、通州等地大肆杀掠以后，又向东进据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并企图打开山海关一线，由抚宁附近进攻距关３０里的凤凰店，但被明军官维贤部力战击退，这一目的未能达到。结果，金兵不敢孤军久悬，只好一面送信给明朝“ 议和 ”，一面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永平等四城，大军匆匆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三月由冷口（迁安东北）出长城归国。而留守四城的金军虽然都是精锐部队， 又由皇太极的堂兄阿敏等人统率， 但不久就被孙承宗指挥的山西总兵马世龙以及祖大寿军队打败，伤亡数千人，四城完全被明军攻破，阿敏等人因此获罪。可见，以上所说的袁崇焕反对速胜，主张持久，反对在不利的条件下决战，主张在各路援军齐至，敌人饥饿沮丧斗志低下的情况下，前截堵后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可能获胜的。可惜的是袁崇焕突然被捕，形势大变，明朝也就难以有所作为了。

八、蒙冤而死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狱中题壁》

袁崇焕为什么突然遭到逮捕呢？

原来在宁远、宁锦两次大捷后，后金就感到袁崇焕是个劲敌，但是无可奈何。其后，章京范文程就献上密计，要施行反间计，在广渠门、左安门两次血战以后，皇太极又一次感到不把袁崇焕除去就不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刚好，金兵到达北京牧马场时，明朝管马的杨太监等二人和其他３００人一起投降。太监是接近皇上的人，皇太极就在他们身上打起了主意，想出了一条反间计。他袭用《三国演义》中所讲的周瑜利用曹操的说客使曹操中了反间计的手法，利用了这两个太监。皇太极一面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兵到南海子，一面嘱咐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教他们如何进行反间。这两人在听到皇太极的密计以后，就故意坐在杨太监等二人睡觉附近的地方，低声耳语，故意让他们听到，说是 ：“ 今天撤兵，是皇上的计划。刚才看见皇上一个人骑马走向敌阵，敌方有两个人来

见皇上，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才回去。估计袁督师和我们有密约，这件事立刻就能成功 。”杨太监不知是计，还假装睡着偷听，把他们的话默记下来。事后金兵又故意放松戒备，让杨太监能够避开监守，在三十日逃回北京（有人怀疑杨太监本身就是后金收买的间谍）。杨太监回京以后，就把偷听的话一一告诉了思宗。崇祯这个猜忌多疑而又自作聪明的皇帝，在袁崇焕杀死毛文龙以后，本来就对袁崇焕有些怀疑，这次听了杨太监的话果然中计，认为确有其事，就在十二月初一日再次召见袁崇焕时，把他逮捕下狱。

袁崇焕的被捕，除了思宗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外，还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毛文龙是阉党，又是浙江人。在他生前，每年从朝廷领来上百万的饷银，大半不出都门，而由他送给有势力的阉党官僚。自他被袁崇焕杀死以后，经常受他贿赂的阉党残余失去了一笔重大的财源，当然恨袁崇焕入骨。因此，毛文龙的同乡而又同阉党密切勾结的礼部侍郎温体仁以及同袁崇焕有私隙的兵部尚书梁廷栋，就伙同党羽阴谋陷害袁崇焕。当金兵盘踞在通州的时候，温体仁就密疏攻击袁崇焕，说他“以五年平辽东欺骗皇上，实际是要同后金议和，现在又引诱敌兵长驱直入，目的在胁制朝廷，订立城下之盟”。

（二）宦官和皇亲国戚们都在北京城外占有庄、店、邸、墓等产业，金兵到来，无疑受到糟蹋，他们非常痛心。这些人既不懂军事，又只保护自己的私利，就十分主观地要求袁崇焕赶快将金兵击退。当不能达到目的时，就迁怒袁崇焕，在思宗面前说他“逗留城下，不肯尽力”；甚至散布流言蜚语，诬陷他是叛逆。

（三）大同总兵满桂，起初和袁崇焕一同守宁远。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满桂首先主张放弃宁远城，受到袁崇焕的斥责。后来，满桂又因与祖大寿不和被袁崇焕调开。因此，他对袁崇焕很不满意，甚至怀恨在心。这一次他由大同带兵入援，为了制造群众对袁崇焕的不满，竟然命令部下假称袁军，在京郊大肆进行掳掠。后来，在德胜门一战中，他败入瓮城，又贿赂宦官，在思宗面前搬弄是非，中伤袁崇焕。在袁崇焕被捕的这一天，更无中生有地当面“揭发”袁崇焕的“奸状”。这些都加深了思宗对袁崇焕的怀疑。此外，侯世禄从宣府带来的援兵也曾进行掳掠，当时有些人搞不清楚，把这些掳掠的“援兵”讹传为“袁崇焕的部下”，结果也使袁崇焕代人受过，为一些人所不满。

袁崇焕虽然被捕下狱，但还不一定就被处死。袁崇焕的被捕使他的部将十分恐惧，与其关系密切的锦州总兵祖大寿，深恐督师被捕会连累自己，于是与何

可刚带师离开了北京，逃出山海关。袁崇焕的部队是抵抗后金军的主力，只有这支军队曾经屡次打败过金军，也只有袁崇焕对这支军队享有极高的威信。崇祯帝没有办法，只好叫袁崇焕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祖大寿。叫祖大寿等要以忠义为重，以大局为重，听从朝廷命令，团结一心，坚持抗金，决不可因为他个人的生死而轻举妄动， 不要危害抗金大业。 因为害怕引起类似的兵变事件，崇祯帝在后金直接威胁北京、横行关内的情况下暂时没有对袁崇焕作出最后的判决。后来，当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狱中亲笔信时，全军都痛哭起来，祖大寿的老母亲已经８０多岁了，当时跟儿子在一起，问明了大家痛哭的原因，就对大家说 :“ 督师现在还没有死，何不杀敌立功，再向皇上要求保住督师的命 ？” 众将士以为这样做很对，当天就回师入关，奋勇杀敌。希望能用战功来保住他们所敬爱的主帅的性命。后来，祖大寿在收复永平等四城的战役中立下了相当的功勋。思宗认为袁崇焕和他的部下还是愿意抗金的，疑心稍微消释了些，想再启用袁崇焕。思宗并且说过“ 守宁远非袁蛮子不可 ”的话。当兵科给事中钱家修上疏为袁崇焕伸冤时，思宗也有“ 袁崇焕讯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拟擢用 ”的批答。可见袁崇焕不但可能不死，而且还可能再次被任用。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除了敌人的诡计以及某些人对袁崇焕个人不满以外，还被仇恨东林党的人所利用，作为朝廷党争的工具，所以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原来自从魏忠贤倒台以后，思宗大量任用东林党人。当时连续担任内阁首辅的李标、韩爌、成基命以及大学士钱龙锡、左都御史曹于汴等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崇祯二年，在思宗直接指挥下，主持确定魏忠贤逆案，把阉党分子２６２人分为六等治罪，称为“钦定逆案”，颁行全国。但是，阉党漏网分子吏部尚书王永光和他所涉及的御史高捷、袁弘勋以及曾因作诗谄媚魏阉而被弹劾的温体仁等，日夜思量着翻案之事。他们就利用思宗对袁崇焕的怀疑并且利用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前曾和东林党人钱龙锡商量过这件事为口实，企图兴起大狱。他们商量好，指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为“逆党”，想再立一个“逆案”，和前述的“钦定逆案”相抵，对东林党人实行打击、报复、排挤，并乘机翻案。于是残余阉党分子原抱奇、姚宗文在朝廷造谣说：“有人捉到奸细七人，这七人自称是袁崇焕教他们送信给敌人的。”但是，后来到会审时，这七个被捕的奸细忽然都不翼而飞了。这很明显是对袁崇焕的诬蔑。

同时，温体仁、梁廷栋、高捷、姚宗文等人又多次上疏，除了说袁崇焕“引敌胁和”以外，又说他通

敌叛国。根据是：

（一）擅自杀害毛文龙就是为了讨好金国，便于同敌人讲和；而且金兵进攻北京，也是毛文龙被杀减弱了辽东实力的缘故。

（二）袁崇焕卖米给依附后金的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就是通敌明证（崇祯二年，束不的因遭受旱灾，想勾结后金，骚扰明朝北部边疆，袁崇焕为了争取束不的，向思宗奏明卖米给他）。

（三）祖大寿引兵东去，意图叛变，是袁崇焕与钱龙锡挑激所致。

（四）后金入侵后，屡次谴使议和，与袁崇焕串通一气，呼吸相应（按：后金遣使议和，可以证实袁崇焕“引敌胁和”的流言，由思宗因疑而将袁崇焕处死，因此也是后金的一种反间手段）。

为了证实袁崇焕的罪状，梁廷栋等还无耻地收买袁崇焕的部将副总兵谢尚政，许以高官厚禄，教他出来证实袁崇焕资敌私通之罪。此外，梁廷栋等还说袁崇焕收刮毛文龙的貂皮、人参、辎重价值百万，捆载而西，转运到自己家中，并且说这件事为“万目所共睹”，替袁崇焕加上贪污的罪名。总之，阉党“出间金数十万，飞箝上下，流言小说，造作端末”，造成“不特烈皇（崇祯帝）证其先入；朝野传告，亦为信然”。阉党分子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散布种种流言，

安排重重陷阱，一定要坐实袁崇焕叛逆之罪，置他于死地，以便进一步陷害东林党人。

袁崇焕下狱以后，东林党人纷纷受到攻击排挤。钱龙锡首先在崇祯三年初称病辞职（后来还被捕下狱，罚往定海卫充军）。韩爌、李标、 曹于汴也先后在正月、三月里被排挤去职。成基命虽然继续担任内阁首辅，但是因为周延儒、温体仁相继入阁，对他进行掣肘，所以也只好在七、八月间辞职不干。这时，在政治上，反东林党的内阁已经形成，大权落在温体仁等手里。军事方面，永平等四城已在五月中旬收复、战争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因此，他们又利用这一时机，肆无忌惮地攻击东林党， 想早点把袁崇焕杀了， 把“罪案”确定下来。史范在八月里上疏说 :“钱龙锡出京时，曾把袁崇焕所送的重贿数万两寄存在亲戚家中，替袁崇焕活动，所以袁崇焕到现在还没有定罪 。”又说：钱龙锡、袁崇焕卖国欺君，他们的罪恶胜过秦桧（当然，毛文龙的功绩就超过岳飞了 !)。连续用这些话激怒思宗。果然，思宗发怒起来，限刑官在五日内定案。这样，袁崇焕就遭到和熊廷弼同样的悲惨命运。虽然当时朝臣十之七八了解袁崇焕的冤枉，但是因为温体仁、梁廷栋等正得到思宗的信任，为袁崇焕申冤的话说不进去；并且替袁崇焕申冤的人如御史罗万爵等，又纷纷被加罪，大家都怕被加上“逆党”的

罪名，不敢冒险援救。这样一来，袁崇焕就非死不可了。与袁崇焕有联系的东林党当然随之受到打击，政治局势的进一步败坏就是不可避免的。

袁崇焕的被捕下狱，皇太极的反间计不过是个导火索，其中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崇祯皇帝即位后，锐意中兴，诛阉党、定逆案，颇有一番新政。然而在他面前仍摆着两个最棘手的难题：一个是农民起义。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十一月，陕北因连年大饥、官吏横征暴敛，王二首举义旗，闯王高迎祥等相继起事。另一个就是辽东问题。而这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辽事不结束，对粮饷的加派不会停止，民不得不反；民变迭起，官军不能一意东向，辽事更不易了结。崇祯皇帝将辽事重任委于袁崇焕，袁崇焕许以五年平辽，崇祯似已看到摆脱困境的希望。“已巳之变”后金铁骑震撼京师，“五年平辽”已成画饼，预示了“新政”棋局将全盘皆输。加之自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以来，京都８０年来首罹兵祸，星布于北直隶的中贵庄田被劫掠，黎民百姓三教九流受蹂躏，激起了朝野各界的普遍不满。这一切对崇祯新政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对朱由检的威望及心理的打击也是极其巨大的。因此，身为蓟辽总督的袁崇焕及兵部尚书王洽等，是难逃其直接责任的。造成英雄悲剧的不仅是崇祯皇帝和逆阉党羽，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

尖锐得无法克服的腐朽荒唐的明王朝。

袁崇焕之死与思宗的为人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思宗上当受骗，袁崇焕是绝对死不了的。那么思宗的为人到底怎样呢？现在不妨简介如下：

11 年少无知，昧于事理，暗于知人

思宗即位之初，不过十六七岁，既缺乏政治经验，更缺乏军事知识。虽然自作聪明，实际却幼稚得很。老奸巨滑的温体仁欺骗了他一辈子。两任首辅、作风不正的周延儒嘲笑他是“羲皇上人”。 崇祯除了对魏忠贤等元凶巨恶，因罪恶昭彰，有所认识以外，对于熊廷弼、王化贞的是非功过就不甚了了。对于东林党也缺乏正确的评价。由于是非不明、忠奸不分，所以往往处置乖方，决策失误。用人失当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自东林党人排斥以后，所用之人，不是奸臣、就是庸臣，兵部尚书中也有不少人是胆小鬼。

21 求治过急，用法过严

边防、吏治、党争是思宗最感棘手之事。这三件事因为由来已久，积因复杂错综，没有一件可以迅速解决。但是思宗求治心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他的办法实际有二：一、力求速效。二、惩办从严。因为不可能求得速效，所以就剩下惩

办从严。崇祯十七年中，总计杀了总督７人，巡抚１１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除三人外，都不得善终。其余官员受到惩办的尚有许多。

严刑峻法，残害英才，是思宗最大的失误之一。

３1 师心自用，饰非拒谏

思宗自以为是，又有虚骄之气。每有失误，群臣进谏，就认为触犯了皇帝的尊严，加上“阻旨”、“藐抗”等罪名， 横加处罚。结果是刚直者去位， 柔佞者幸进， 开谄谀之风，行苟且之政， 纪纲日坏，国事日隳。皇太极在击灭虎墩兔部完成对明朝的包围态势以后说 :“南朝君骄而臣谄，兵弱而民务，亡无日矣 !”皇太极不愧为目光敏锐的政治家，能首先从政治方面看出明朝必然覆灭的命运。

４1 躬勤细务，琐屑苛求

事无巨细，君亲躬勤，不能从大处落目，通盘考虑，解决全局问题，而且容易束缚臣下手脚。琐屑苛求，不能全面论人，区明贤愚曲直。温体仁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专门“摘发细事”、“务为刻核 ”，排击正士，朋比为奸，从而败坏国事的。

５1 心存猜忌，不能容物

封建君主往往患有猜忌的“职业病”，程度虽有不同，本质并无差异。由于心存猜忌，臣下稍有“不逊”或“越权”行为，马上视为侵犯君权，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思宗当然也不会例外。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他才会耿耿于怀；皇太极那种蒋干盗书式的反间计才能收效；阉党残余的挑拨才能使他大动肝火，迫不及待地要处以极刑。

由上述几点看来，袁崇焕之死，固然与思宗少年无知、刚愎自用的个性有关，但也牵涉到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袁崇焕的悲剧是植根于专制制度之中的，因而很难避免。“自古圣贤皆薄命，奸雄恶少尽侯王”；“汉廷荣巧宦，麟阁绌边功”，这些在当时都已经成为规律。既然温体仁这个“外曲谨而内猛鸷、机深刺骨”、极端狡诈、极端阴险的巧宦，深得思宗信任，总计作了八年辅臣，五年首辅，死后还追赠太傅，赐谥“文忠”，可谓富贵寿考、生荣死哀。

那么，袁崇焕这一十足的“傻瓜”，立身行事，与温截然相反，尽管立过很大的功劳，还是落得千刀万剐，罪及母弟、妻、女，就是“理所当然”，不是为怪的了。

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八月，尽管多方搭救，猜忌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还是下令将袁崇焕寸磔（折）处死。思宗本来打算对其施行最残酷的刑罚

灭三族，总计要杀３００余人，还亏得何如宠等竭力解救，成基命再三叩头，请求慎重，才略予减轻。八月十六日， 袁崇焕终于在阴谋诬造的“ 擅杀大将，勾引敌方来胁迫朝廷求和，谋叛欺势的罪名下被凌迟（即磔刑）处死”。临行前，崇焕口占一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此诗表现了他忠心报国、至死不渝的坚强信念和磊落光明的宽阔襟怀。这一年，袁崇焕仅４６岁。袁崇焕的家被查抄， 家被查抄时， 仅“ 祖遗薄产 ”及“ 祖遗屋数椽 ”。 完全证实了他狱中《忆母》、 《寄内》诗中所说的“ 母亲已老家何有 ”、“ 家无担石累卿卿 ”的话。因此，凡稍知其事者无不为之抱屈。袁崇焕的妻子、９岁的女儿以及弟弟崇煜都流放３０００里（家属在辽东的流放到浙江，后改为贵州，在广东原籍的流放到福建）。

《明史·袁崇焕传》写道 ：“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这话未免有夸大个人作用之处，然而确实反映了袁崇焕在抗击后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

重要作用。崇祯帝因袁案自毁“长城”，袁督师之死，给明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袁崇焕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十载在边，殚心竭力，惨淡经营，公而忘私，国而无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爱国情操。为了抵抗后金的掠夺和进扰，袁崇焕“独提一旅，挺出严关”，

“十年来，父母不得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历尽风霜，备尝艰险，为捍卫疆土，捍卫关内人民的利益创立了卓著功勋。他不愧为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光辉业绩永远彪炳史册。

凌迟是一种极端残忍的刑罚。崇祯时，郑□被凌迟处死，目击者说：行刑之役都提一小筐，筐内藏铁钩利刃，时时用砂石磨刀口和钩尖。人声鼎沸之中，听到宣读圣旨：应该剐３６００刀。刽子手百人齐声应和，像雷鸣一样，听的人都吓得发抖。炮声响后，人群拥挤至极，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下刀之初，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只看到一根有丫叉的木头竖在那里，上面勒着一根指头粗的大绳，一个人高高地站在木头后面，伸手下去，拿了肝肺两物，放在丫叉上。又突然将绳子引下，这时剐肉的人一拥而上，多得像刺猬毛一样。片刻之间，小红旗向东飞驰而去，说是把刀数报入宫中。

袁崇焕被凌迟时， 情形当亦相似。《崇祯遗录》载当时哄传袁崇焕谋反，人人切齿。等到行刑时，百姓分食其肉。这些肉食者中，固然有许多听了流言蜚语、不明真相的百姓，但是恐怕也有制造流言蜚语的反东林内阁的爪牙。目的是使思宗坚信不疑袁崇焕确是“罪有应得 ”，以便进一步陷害东林，为阉党翻案。黄尊素《说略》中有：熊廷弼待勘都下，每遇朝审时，行路之人必以瓦砾掷熊，以致满面流血。论者说这是王化贞收买的人干的，目的是假借民意，加重熊廷弼的罪名，为自己开脱罪责。杨士聪《玉堂荟记》说：“蜚语皆出自内阁 ”，然则啖袁崇焕肉事亦是温体仁、梁廷栋之流仿效刘瑾先例，效王化贞故智，促使其爪牙为之，这是完全可能的。

现把袁崇焕诗《入狱》抄录如下，以见袁督师入狱后的心境：

北阙勤王日，
南冠就执时。
果然尊狱吏，
悔不早舆尸。
执法人难恕，
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

粉骨亦何辞。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袁崇焕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颔联表明早知今日受辱于狱吏，悔不昔日战死于沙场。颈联暗指为了整肃军纪而杀毛文龙，责满桂……因而招来怨尤。尾联表现出了于谦那种“粉骨碎身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的牺牲精神和坦荡胸怀。

袁崇焕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由于袁崇焕的冤死，后来孙承宗的辞去，直接间接地打击了抗击后金的军民，削弱了明军的军事力量，给后金一步一步地侵占边疆（如后来攻占锦州、松山等地），并且多次进犯内地造成了有利条件。袁崇焕的冤死，使明朝“兵临城下，而自坏万里长城”，失去了真正能负起镇抚辽东的栋梁，亦为后金进掠明朝江山搬去了大障碍。真正如《明史》所评：“自袁崇焕，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九、奇冤昭雪

袁崇焕被杀以后，朝野议论纷纷。

有些人受了阉党恶意宣传的蒙蔽，以为他确实有“通敌叛国”、“杀将主和”、“拥兵纵政”之罪。另外，有些人认为他过去立了大功，现在即使有罪，也不应就判处死刑。明朝末年，有一些有识见、有骨气的人如夏允彝、张岱、吴应箕、文秉等，都不知道袁崇焕的冤枉。张岱甚至认为袁崇焕主和误国，其罪浮于秦桧。而东林党人，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例如，刘宗周在奏疏中说：“已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可见他认为袁崇焕是有罪的。同袁崇焕关系密切而又了解他的孙承宗就不同了。他在《闻袁自如被逮》诗中不但称赞袁崇焕是“千古英雄手”，而且为他洒泪而鸣“不平”。他既然替袁崇焕鸣不平，当然不会相信袁崇焕通敌叛国。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肯定地指出袁崇焕的“叛国”罪是敌人设计制造出来的，所以也不可能出来替袁崇焕雪冤。

当时有一个替袁崇焕鸣冤的程本直，曾在奏疏中指出袁崇焕的冤狱“非群疑之误中，实敌间之密成”，这位义士目光如电，可说接触到事情的真相，一语道

破了冤狱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敌间”。但是，他不可能掌握敌人行间的确凿证据，进而澄清事实，纠正冤案。因此，他自己也就不免被扣上“逆党”的罪名，与袁崇焕同时遭到杀害。

除了孙承宗、程本直以外，当时也还有许多态度公正、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的人，根据袁崇焕的一贯表现以及当时的客观形势，判定袁崇焕是冤枉的。他们从维护民族的利益出发，大胆地进行营救。如前面所说的兵科给事钱家修，就曾积极地替袁崇焕反冤，并且为了释放袁崇焕，他情愿同陷害袁崇焕的阉党分子姚宗文一同“寸斩，以谢天下”。还有一个名叫许俊的义士，他曾连续两次上疏，为袁崇焕申诉。他在疏中说：“袁崇焕某日提兵至兵营，在某处发火器矢石，斩首若干；又某日在某处斩首若干。假如他真是引敌胁和，那么三天所得首级从何而来？假如他真是不能战或战败了，那么，后来能战者又有何人？”疏上以后，义士被判充军。许俊又上疏说：“假如袁崇焕通敌卖国，那么，我就是逆党，应该和袁崇焕一起处斩。假如袁崇焕不是卖国，那么我就无罪，判处充军是不合法的！”疏上以后，朝廷也拿他无可奈何。

此外，袁崇焕的部下祖大寿，曾请求以自己的官阶封荫赎出袁崇焕；何之壁曾率领家中４０余口，到北京来请求代替袁崇焕监禁，让袁崇焕能够去抗击金

兵。关外吏民听到袁崇焕被捕的消息，更是天天到督抚孙承宗处哭号，请求代为申雪。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袁崇焕的冤死是明王朝统治危机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标志。此后，东北防务大大削弱，后金军几次攻入关内，威胁北京。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杀，宣布了明王朝的崩溃。这时，一部分封建大官僚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倒是真的丧心病狂地勾引清军入关，来镇压农民起义军。这一年的五月，清军占据北京，清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登上了明崇皇帝所时刻耽心而终于保不住的宝座。以农民军为主的人民群众则到处展开了武装抗清斗争；正是依靠人民的力量，在南方又建立过三个南明政权。思宗自杀后，福王在南京即位，又有人（主事梁稷、中书邝露）上疏替袁崇焕诉冤，才得平反昭雪，复官赐葬。但因袁崇焕葬在北京，没有来得及改葬。再后来， 桂王在广东，有人从北方来， 用清太宗（皇太极）档案中的话替袁崇焕申冤，又再一次平反昭雪，恢复官职， 并赐予跟熊廷弼一样的谥号。但是， 知道袁崇焕冤屈的人还是不多的。等到清朝人撰修《明史》，为袁崇焕立传时， 朱彝尊等从《太宗实录》中看到皇太极实行反间计的记载，找到了真凭实据，才

把这一千古奇冤写进了《袁崇焕传》， 从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把过去阉党分子散布的歪曲事实的迷雾一扫而空。

袁崇焕被杀以后，没有人敢替他收尸。这时有一位姓佘的义士，本来是袁崇焕的仆人，因为同情袁崇焕的遭遇，尊敬他是一位坚决抗金的民族英雄，就冒着生命危险，把袁崇焕的遗体偷回来，安葬在他生前和后金大战过的广渠门内，并且决心永远守着这座坟墓。后来，这位姓佘的义士死了，他的子孙遵照他的遗命，把他安葬在袁崇焕的墓旁，并且世世代代守护在那里。

清兵入关之初，因为满族人少，经济文化落后，不得不大量任用汉奸。又因为努尔哈赤曾经接受过明朝的封号、现在反过来夺取了明朝的江山，于义不顾，所以很少公开提倡“ 忠 ”字。等到乾隆时，清朝统治已经巩固，为了鼓励臣下效忠朝廷，也为了表示满汉一家，不分畛域，于是对明代死难的诸位大臣，大力表彰，如史可法被追谥为“ 忠正 ”，就是一例。另一方面， 则将明代降臣如洪承畴等编入《贰臣传》，加以鞭挞。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乾隆下谕说 :“ 袁崇焕督师蓟辽，尚能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诚悃， 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着查其子孙有无出

仕 。”不久，又奉圣旨，授其五世嗣孙为峡江县丞。以后，在东莞还专门建了袁崇焕祠，乾隆题了“忠于所事”匾额，何耘劬撰了一副对联 :“天命有归，万里长城空自；人心不死，千秋直道任公评 。”嘉庆三年九月，又令入祀贤良祠。

在北京，也有人把袁崇焕的墓重行修理，并在墓前加了一方刻着“有明袁大将军墓”七个大字的石碑。碑为著名书家南海吴荣光所书。字大尺余，极其瑰伟。

除袁墓之外，后来广东人又在北京建造起了一座“袁祠 ”，地址就在左安门附近的龙潭湖。祠堂门口有康有为写的“袁督师庙”的横额和一副对联：

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
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冤；
闻鼙鼓思辽东将帅，一夫当关
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

祠堂里面还有袁崇焕督师的遗像以及刻在两边墙壁上的袁督师遗诗、佘义士墓志等。

袁崇焕是岳飞式的民族英雄。袁墓、袁祠和西湖上的岳坟、岳庙南北辉映。从这两位英雄人物被害前后的遭遇看来，一个真正对人民有贡献的人，是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的，是永远受到人民的爱戴的。

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在１９５２年采纳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叶恭绰、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建议，重修了袁祠、袁墓。１９５２年８月，叶恭绰曾代李济深写过一篇碑文，说明建碑缘起，并说修整后的袁祠、 袁墓 ：“ 将蔚为首都名胜， 与文文山（文天祥）祠并垂不朽 。”

自从袁崇焕的冤案平反以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他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的善于用兵的军事才能，他的激励人心的爱国诗篇， 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斗志， 特别是外患严重的动乱年代（如辛亥革命前夕、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始终纪念和敬仰这位民族英雄， 把他作为教育自己和后代的光辉榜样。

十、光辉思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袁崇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堪称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卓越军事家。自后金发难以来，“辽左军兴，国事日棘”，被明朝先后任命辽东的封疆大吏有十几人，然其中能“诘戎兵以保疆圉者”，仅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人。其中功勋最显，战绩最著者，还要属袁崇焕。袁崇焕为人慷慨，胆壮机敏，自少喜好谈兵，常“以边才自许”，具有很好的军事素质。

他在任邵武知县时，便已通过向老校退卒调查讯问，略晓边外形势及险要厄塞。自请报效边关前，又单骑巡视关上，进行了实地考察。出任辽东后，曾随孙承宗遍阅关外布防，从而对“三州形势，两河地势，水陆机宜，兵马虚实，颇得其大”。掌握了克敌制胜的第一手资料。袁崇焕，在其４６年的短短一生中，特别是他七载边疆的戎马生涯中，其一言一行，都给祖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永垂青史。

（一）“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关心国家的存亡，并忘我地为之奋斗，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身处明王朝腐败无能，面临国家生死存亡多事之秋的袁崇焕，身居文职末吏，尚能关心边务，能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了解辽东前线的军事形势；在朝野一片失败主义声中，能以“边才自许”；当辽东十分危急之时，以其大智大勇，单骑出阅关外、体察军事形势；归来便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主动弃文就武，出关监军。

在此，不难看出，袁崇焕不但具有为国家的存亡，置个人之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而且为了扭转逆势，提出克敌制胜的大方略；他只身冒险于两军前沿，以取得第一手材料的科学精神，即便在他下狱待死之时，闻金军击溃新任武经略满桂所部与为己下狱的部将“祖大寿引大队夺关而去，归宁远”的消息，当京师“举城皇皇不可终日”之时，尚能亲书檄文，调回祖大寿，何可刚部解京师之围。即所谓“一纸书，就足以却敌”，以国家为重的精神。凡此种精神，无论在何时代，都是国家和民族的精华，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乃为时代之脊梁。

袁崇焕从一个监军佥事成为一个身负重任的封疆大吏，并在抗金战争中做出杰出贡献，不仅与他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出类拔萃的军事才干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他的性格特点、作风气质密切相关。

袁崇焕果敢顽强，“胆魄称雄”，具有“生死之心，身家不顾”的献身精神。他到辽东后曾表示“我不惜生命”。在被派往前屯安抚辽民时，“夜行于荆棘，蒙茸虎狼潜伏之地”，四鼓入城，将士无不佩服。宁远危机，强敌压境，袁崇焕不仅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且为了安定军心，接老母、妻子于城中，誓与宁远共存亡，表现了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给守城将士以极大鼓舞。

袁崇焕稳健刚毅、沉着镇定，能够临危不乱，遇事不慌。据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记载，朝鲜译官韩瑗曾亲见宁远之战的情景。战前，“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有忧色”，直至将敌人诱入外城，才“出其不意”，突然袭击，使敌人“措手不及而败走”。崇焕沉着冷静，胆魄如此，“直乃大将风范，有诸葛武侯风”。

袁崇焕“为人疏直”，嫉恶如仇。当天启年间，阉党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中外方争颂忠贤”时，袁崇焕却“於大鲜所结好”。在魏忠贤派阉党往辽东监军时，袁崇焕上疏抗谏，坚决反对，因此，他始终不为忠贤所喜。宁锦大捷“一时文武滥冒赠秩赐荫者数百人”，甚至魏忠贤的重孙尚在襁褓中也被封伯，而崇焕却只赠一秩，最后不得不乞休辞官。袁崇焕对

阉党骨坚气直， 对部将却不拘礼法，平等相待，“ 推心置腹 ”，因此，“ 诸将与崇焕恩信相结，骨肉弗逾”。袁崇焕对士卒也十分关心， 身为将帅，“ 能与士卒同甘苦 ”，深得士卒的爱戴，大家都乐意为他尽力。

明朝末年，朝廷皆暗，吏治腐败，政以贿成。在边将领“ 贪情者多 ”。 有些人甚至“ 大袖高巾，昼夜聚饮，沉缅于金谷，流连于青楼，弓矢器械，十无有一，……惟望奴酋一到为散场 。” 而袁崇焕与这些贪鄙怯弱的边将迥然不同，他持身严谨，居官清廉，既不贪图功名，也不醉心利禄。在福建，他“ 向为县令不取一钱 ”。“ 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抚弱，所在有声 ”。“ 身为将帅，未尝为子弟乞一官 ”， 死后被抄家时，“ 家无余赀 ”。所没收的只是“ 祖遗薄产 ”。袁崇焕这种节俭自持，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在那种“ 人务奔竞，苞苴恣行 ” 的年月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袁崇焕虽身为武将，远在边外，却十分关注朝廷大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当时，朝廷内部党派纷争，直接牵动着辽东战事，袁崇焕对此十分忧患。他在《偕诸将同游海岛》诗中写到 :“ 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 ”。 表明了自己对于国难当头，朝官们却同室操戈，相互倾轧的愤懑和担忧。他从“ 前此熊廷弼、

孙承宗皆为人所排构，不得竟其志”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是贻祸封疆，败坏辽事的重要原因，尤其当自己为阉党排挤之后，更痛切地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在他重新得到任用时，向崇祯皇帝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内，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而且“任事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闻之，是以为边臣甚难。”因此，他请崇祯“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袁崇焕的一席话，指出了朝廷党争对边臣的牵制掣肘，道出了明朝在辽东战场屡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极端的皇权专制，所以，他把希望寄托于崇祯帝身上完全不可能解决问题。尽管他得到崇祯帝的优诏答复，却最终未能逃出奸党谗害。边事危急，国难当头，一代名将未能战死沙场，却死于门户，这个历史教训确实够深刻的。

值得称道的是，虽然袁崇焕知道“边臣甚难”，“中有所危”，却并没有畏惧退缩，明哲保身。他顾全大局，敢作敢为，但有利封疆，便“彻里承当”，绝无反顾。在他下决心铲除隐患，擒杀毛文龙时，部

将何可刚曾提醒他 :“生文龙，国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 袁崇焕也自知“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 ”，然而为了早日实现恢复辽东的宏伟目标，还是报着“苟利封疆，臣死不避”的决心，除掉了毛文龙。在后金入关，占领蓟州，大举向京师进攻时，袁崇焕“议趋京师 ”，堵截后金军队。当时已有谣言说“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 他的部下劝他说 :“大兵宜向敌，不宜先入都 。”况且“外镇之兵，未奉明旨，而经至城下”也是不允许的，而袁崇焕坚决地说 :“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表现了他不畏讦构，不避嫌猜，坚毅不拔的刚强性格和光明磊落，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

袁崇焕的高尚爱国情操，果敢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正直，廉洁、忠笃、勤勉、襟怀坦白的优秀品质，使他赢得了人民群众和辽东将士的衷心爱戴。袁崇焕含冤入狱后， 辽东将士“彻夜号啼， 莫知所处 ”，“长安庶士无不愿以百口相保也”。 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布衣程本直进宫辩冤，愿为同死；何之壁率家４０余口诣阙代监，祖大寿愿以官阶历次封赠为崇焕请罪，至于“关外官兵士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 袁崇焕的死，天下冤之，连清乾隆皇帝也说：“袁崇焕督师蓟辽，尚所忠于所事， 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深可悯恻 。”袁崇焕的死，实

在是千古奇冤，它对于明朝抗击后金是一个巨大损失，正如夏燮在《明通鉴》中所说 ：“古今来被绐而偾厥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壮烈帝此举之甚也”。

“自古长城慨古今，永留毅魄壮山河 。”３００年前袁崇焕悲剧所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至今思起，仍令人扼腕称叹，感慨万端。残酷的封建专制制度可以与磔袁崇焕的躯体，却不能磨灭他在人们心中的高大形象，袁崇焕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名将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二）“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的战略思想

袁崇焕在向朝廷陈奏战守方略时，曾一再指出，恢复之计，不外“以辽人守辽土， 以辽土养辽人”。也就是说，用辽东军民守卫辽东国土，以辽东的物产供养辽东军民，这在当时不仅是一个节省人力、财力的正确方针，而且是坚守关外的具有战略性的根本大计。后金突入辽东，使大批辽民离乡背井，四出逃亡，仅广宁陷落，“军民溃入者，且２８０万矣”。大批难民集结关上，“数万人皆野栖露处， 讵任祁寒，万千间席舍冲棚，曾无土垒”。 他们无衣无食，嗷嗷待哺，急需安抚，这给山海关城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这些难民历经战乱之苦， 人情汹汹， 如惊弓之鸟，

“刻刻警惶”，往往“互煽互惊，立见兽散之势”。这也使山海关一带的社会安定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可知，能否妥善安置辽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化消极为积极，不仅关系着难民的生死存亡，而且直接影响着边关的巩固和安定。

然而，以往的辽东统帅往往都没有注意发挥当地辽民的作用，尤其在广宁失守后，一些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关内的官员，更把辽民视为“土寇”，“各处疾辽人如仇，惟恐驱之不远”。甚至辽东经略王在晋也以辽民“终日思父母，思妻子，思乡井，欲亡命奔逃”，偷生臣虏，而主张“立法不用辽人”。这样，为应付辽东战局，明廷便不得不从内地及各边抽调大量军队赴山海关应急。这些远来的征调之兵，号为客兵。“客兵利速战”，不宜久守，“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而且，随着“边衅渐开”，战局扩大，九边已自顾不暇，“不宜舍己芸人”。为了应付征调，各地往往雇佣一些“惯逃之手”充数，结果是“宁但不能为辽援，而主客不安，先已为辽之忧”。再者，当时全辽兵食完全仰仗于天津漕运，置辽民而不用而专恃客兵，势必加重调募转输的负担，不但使“国储外分，京廋日罄”，也必然使四方百姓受累，造成“以辽东疲天下”的被动局面。显而易见，用辽人与否，决不简单是一个局部的策略

问题，而是关系到关外能否坚守，抗金斗争能否顺利进行的战略性决策。

袁崇焕坚决反对视辽民为土寇，为渊驱鱼，舍近求远的错误主张。他初到辽东，正遇十三山处有十万坚持斗争的辽民被后金围困，便积极建议发兵援救，指责上方“委十万人置之度外”的错误作法。袁崇焕的建议得到了赴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的支持。他指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此大计也 。” 对十三山的辽人义民，“法当如崇焕议…… 迎护以归，强者练兵，弱者屯牧，以复己之资也 。”以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孙承宗、 袁崇焕努力安抚边民，招募辽兵，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进行抗击后金的战争。从而在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这短短的四年期间先后拓地４００里，招回辽民４０万，辽兵３万，屯田５０００顷，修大城９座，堡４５座，练兵１１万，制造兵甲器械数百万，稳定了关上形势，增强了防御力量， 形成了“兵民安堵，文武辑睦， 商旅云屯”的大好局面。

孙承宗去职以后，袁崇焕更加坚定贯彻和执行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采取了“且战且守，且筑且屯”的具体措施，招抚流亡屯垦耕种，撤回客兵，招辽人填补，从而不仅长期保证了兵源，而且“以辽人守辽土，不必更为征调以疲九

边；以辽土养辽人，不必尽赖转输以罄四海”。 收到稳定局势，增加储寄，存减粮饷的良好效果。

事实证明，辽民不但可用，而且是抗击后金战争中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骨干力量。 宁远一战，“自虏中拔归者，俱愤怒，可一当百 ”，表现得十分勇敢顽强。“宁锦屡捷，半是辽人摧锋陷阵者可见也”。至于北京保卫战，更是赖辽兵之奋战。京师解围，自不待言，即以后驱赶后金，收复失地，也“皆辽兵之力”。

还应提到的是，用辽人的思想，争取了人心，赢得了广大辽民的衷心拥护和热情支持，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努尔哈赤自夺取抚顺后，在攻占开铁、辽沈、广宁时都采用以叛臣、奸细为内应，里外结合的手法取胜的，惟宁远一战，十几万大军围困孤城， 城中军民在强敌面前人心归一，众志成城，“独无夺门之敌，内应之奸细”。 这也深刻地体现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思想在抗金斗争中的又一重大作用。

（三）坚守关外，以捍关内的积极防御方针

袁崇焕初到辽东，正直广宁失守，关外“满目兵灾，河西７００里边城，俱为煨烬，关以外几成异域矣”。 面对这种残破不堪的局面，明朝统治者内部许多人都被后金气势汹汹的进扰所吓倒，根本不敢有所

作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代熊廷弼主持军务后，畏缩怯敌，害怕与后金交战，力主放弃关外，专守关内。但又“耻于莅关无所为”，恐为人议论，于是提出了在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驻兵把守的方略。这完全是一个苟且偷生，懦弱无为的消极防御措施，其实质是尽弃关外失地，龟缩山海一隅，袁崇焕“以为非策”，表示坚决反对。他以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关门要害也”，“在山海之东，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是联结关内外的咽喉所在。广宁失守后，宁远即成为山海关门的直接屏障。放弃宁远，则关外难守；关外不保，不但辽东收复无望，即是山海关也难固守。所以，关外不可轻撤，宁远势在必保。从地理形势上看，宁远一带，地形险要，易于防守。这里“山出其后，海峙其前”，又有觉华岛“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腕，可厄敌之用”。这样，水陆相连，遥相呼应，使后金无论从陆地，还是海道都难以突破，正如孙承宗所说，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京师，必不可不守”。 从军事布局来看，自广宁溃败，明朝已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王在晋曾指出，辽东战局，“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 铁，三坏于辽、沈，至于四坏， 捐弃全辽，则无局可布矣”。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坚持驻守关外，力争占取广宁以西几百里真空地带，则必然造成“逐步退缩至山海，此

后再无一步可退”的被动局面。而守在宁远，“驱西虏于２００里外，以渐远于关城”，就可形成一段缓冲地带，避免山海关直接被兵。同时，驻守宁远，进可攻，退可守，便于相机而动，敌人即或越一城而前，宁城已缀其后，即或合一城而守之，各城已扼其吭，即或直抵关门不顾，而前有坚城，后有追兵，自可立见扫荡。显而易见，袁崇焕坚守关外，以捍关内的主张是一个立足于防守，却着眼于收复辽东，徐图大举的切实可行的积极防御的正确方针。袁崇焕的主张得到了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他指出：“拒贼于门庭之中，与拒贼于门庭之外，其势既辨；而促贼于２００里之外，与贼促于２００里之中，其势又辨。”同时指出，守关必须复辽，而复辽必须屯兵关外。因此，宁远之议，“必不可轻罢”。在孙承宗代王在晋辽东经略后，更以“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直接调他任宁前兵备道，负责宁远守备。在宁远，袁崇焕依照坚守关外，屏障关内，以守为攻的方针，努力营建宁远，加强设施。他亲定了筑城规制，令祖大寿等人督建。一年后工迄城竣，袁崇焕又配备火炮，“以铳护城”，加强破敌攻势，使宁远整治一新，成为“内以保障关门，外以捍御强虏”的关外重镇。一度曾经是“灰尽煨残，白骨暴露”的宁前一带，现在已成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相望的“乐土”。宁远的巩固，

使它成为屏卫山海关的坚强阵地。正由于此，尽管高第曾尽撤锦、右诸城守具，极大地破坏了关外防卫，赖有宁远坚城存在，后 金始终不敢“ 轻越其郊 ”，“ 舍坚城而西 ”去攻山海，惟恐宁远缀后，腹背受敌。宁远大捷后，袁崇焕收复了高第所弃旧土，重新构筑了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凌等城，再度建立起巩固的宁锦防线，成为阻挡后金的一条坚强的铜墙铁壁。以后皇太极见宁锦无隙可趁，曾多次绕道蒙古，突击蓟门，入关侵扰，但始终“ 未得明寸土之地 ”，其原因盖在于宁锦未破，山海挺立，恐后路被截，沈阳受攻，而不敢久留。由此可见，驻宁锦、保关外，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以守为主，以战、和为辅的策略原则

袁崇焕在对敌斗争中，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确立了“ 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 ”的策略原则。所谓“ 守为正著 ”就是讲要力戒野战，致力坚城固守。当时，后金已“ 四十年蓄聚 ”，兵强马壮，且自交兵以来，每战必捷，士气正盛，“ 奴乘屡胜之势，而我当披靡之余，不据险以守，无以固人心 。”因此袁崇焕认为强敌面前不可轻举妄动，只有立足坚守才能稳定局势，“ 若贪一击之利， 合属交锋，以前之祸立见 。”同时袁崇焕根据八旗兵习于野战，精于骑射，

不利攻坚，而明朝“兵不习野战”的特点，制定了防守的具体措施，即“高城池深，利兵坚甲”，“凭坚城，用大炮一策”。事实证明，袁崇焕的以守为主的策略和措施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它使得明军得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攻击敌人的短处，化被动为主动，处于有利地位。宁远战役中，袁崇焕正是运用了这种以守为战的策略，凭坚城，用大炮取得了胜利。他分析后金远来，“利速战，而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于是以静制动，以逸待劳，避开与后金正面交锋，只“一味死守”，使后金骑兵在坚城前无以发挥优势，同时充分发挥红夷大炮的威力，“从城上击，周而不停”，使敌人死伤无数，后金虽老于攻战，却“无得而与我战”，结果自困而败。

袁崇焕以守为正著，绝非龟缩不前，同时辅以“战为奇著”。即积极操练军马，“乘间击暇以为用”，相机而动，出奇制胜，使战守结合，相辅相成。宁锦战役，袁崇焕便利用大炮击退敌兵的同时，在战机允许的情况下，派出军队迎击敌人，取得胜利的。

在战、守的同时，袁崇焕还利用和谈作为缓敌之计，争取时间，修整装备，巩固边防。这就是所谓的“和为旁著”。宁远战后，由于高第撤防，后金破坏，使军民大量集结关外四城，出现了“地隘人稠”，粮饷紧缺的困难局面。因此，急需修复锦州、中左、大

凌等城，“业移商民”，广开屯种”。为了避免“城不完而敌竟至”，中途而废，袁崇焕提出“以和之说缓之”，这样待敌人知道，“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４００里之外，金汤固矣”。

袁崇焕的“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术原则，是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确立的。在这个原则中，“战、守、和”三个方面层层相因，互为前提，即所谓“不战何守，不战不守而又何款？”同时这三方面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它强调“守为正著”不忘乘间击惰，出奇制胜。主张“战为奇著”，必定在坚城固御的前提下相机而动，决不盲目出兵。坚持“和为旁著”，却是立足战守，旨在麻痹敌人，争取时间，更好的打击敌人。这样，使“战、守、和”三个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有效地指导了抗金斗争的进行。

在贯彻以守为主，以战、和为辅的战术原则时，袁崇焕还十分强调要循序渐进，“逐步而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他主张“战则死战，守则死守，……步步打实做去”。他反对空言，认为只要做在实处，“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奴，而奴无不平”。他的这种讲求实际的方针，使他在防守时，处处坚备，决不草率应付。在迎战时，力求稳操胜券，决不急功近利，

做到“行军决策，莫不动出万全，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取得抗金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统筹全局的战略布局

随着袁崇焕事权的提高，责任更加重大。崇祯元年，他出任蓟辽督师后，除了着力于宁锦防线的巩固之外，进一步把目光转向抗金斗争的全局布防上。他从“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出发，进行全面军事规划，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蓟门守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次在宁、锦城下受阻，自知宁锦防线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于是将进攻目标转向蓟边。这样，明金战争的主要战场即由辽西走廊移到蓟门边外。袁崇焕作为蓟门督师，及时地估计到后金的意向，了解了这种正在变化的边情，多次上疏，“指陈利害”。他说：“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建议朝廷一定要“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了防患于未然，袁崇焕还派出参将谢尚政前往蓟门增强守备。

联络蒙古，抚西拒东。明金对峙以来，蒙古成为双方极力争取的对象。为了削弱敌人，取得外援，袁崇焕提出“抚西虏以拒东夷”的方针，力主联络蒙古，以作藩篱，防止后金直趋蓟边。他说：“今日之计，

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 即以为我用矣 。”“ 西款一坏，我得一意而防奴 ”， 使“ 奴穷于无所与 ”。为了实现款虏制夷的方略，袁崇焕平台召对后，力荐一向主款、并在蒙古诸部中素有威望的王象乾为宣大总督。当塞外灾荒，蒙古哈喇慎诸部“ 粮食无资，人俱相食 ”，困苦不堪时，袁崇焕为安抚和争取蓟镇边外的蒙古部落，具疏请求以布米救济他们。他说 :“ 我不为各夷所依，夷遂依奴以自固 。”“ 不如因而树德， 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以藉作藩篱 。” 于是“ 召至于边，亲抚慰，皆听命 ”，削弱了后金对蓟边的威胁。

整顿皮岛，以为牵制。天启初年，当辽东相继陷落时，毛文龙却率兵占据东江，设镇皮岛。东江“ 凭险可以设疑，出奇可以制胜，水陆齐通，接济则难，战守则易，有可据之地势 ”。 因此“ 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 ”。而驻守东江的毛文龙却是一个骄恣妄为，糜饷无功，暗通后金，不听节制的奸佞之徒。他在初期虽也曾几次出兵深入后金属地，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但随着实力的扩大，日益跋扈难制，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结果非但“ 犄角无资 ”，反而“ 掣肘兼碍 ”。袁崇焕五年复辽，意在巩固宁锦，安抚蒙古，加强蓟备，形成抵御后金的巩固防线后，即以东江为突破口，加强蓟备，形成抵御后金巩固防线后，即以

东江为突破口，逐渐向辽东推进。这样毛文龙占据皮岛就成为袁崇焕推行“恢复当从东江做起”的战略部署的障碍。在屡次劝说、诱导不成后，袁崇焕果断地除掉了毛文龙。接着安抚士卒，除毛文龙外，“不更处一人”，整饬军队，核查兵马钱粮，“精壮者籍之为兵，老弱者散之归农”，加强了战斗力。同时开释毛文龙“禁苛诸人，与籍没人妻女为妾为婢者”，使皮岛初步得到整顿。

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袁崇焕对恢复辽东已作出精心的战略部署，即在巩固宁锦防线的前提下，北联蒙古，南接皮岛，进而沟通朝鲜以形成对后金的半环形包围圈，然后取道东江，“以正为奇”，步步推进，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

可以设想，袁崇焕的措施如果能够凿凿落实，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其复辽计划的。但一则袁崇焕所依赖的明廷太腐败，对袁崇焕的措施处处作梗。例如，袁崇焕加强“蓟备诸疏，累累千言”，均被搁置，不了了之；提出接济蒙古的建议，也被认为“借寇资盗”、“严行禁止”。所以，使袁崇焕的措施并未很好落实。再者，袁崇焕的敌手皇太极老谋深略，往往先发制人，破坏袁崇焕的部署。正如袁崇焕自己所称：“我欲舍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战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

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 。”真是“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当袁崇焕擒杀毛文龙后，尚未能彻底整顿东江，后来先已假道蒙古，直趋蓟门，使“东江出奇”的计划成为泡影。然，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袁崇焕在五年复辽的战略布局上仍表现出驾驭全局和远见卓识的军事才干。

袁崇焕在“熟谙夷情”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军事措施，成功地抵制了后金的进攻。他作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和卓越的军事干才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与爱戴。